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

普考通

SOCIOLOGY OF ETHNICITY

主办单位：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第 318 期

2020 年 12 月 31 日

目 录

【论 文】

理解民族和民族主义：途径、观念与叙事

范 可

世界的重塑：从“帝国”到“民族国家”

刘德斌

后苏联时代如何塑造新人？

马强访谈

俄建立全俄民族联合会推进国家民族政策战略

马 强

☆☆

Association of Sociology of Ethnicity, Sociology Society of China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Peking University

【论 文】

理解民族和民族主义：途径、观念与叙事¹

范 可²

摘要：民族和民族主义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一直是一个热门话题。对于擅长研究小社区的人类学而言，民族主义作为课题是个挑战。为此，人类学家通常关注诸如地方文化如何在民族主义运动中受到影响，以及传统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如何为民族主义所利用之类问题。从理念上而言，民族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有着亲和性，甚至互联性，并通过一系列的叙事建构来强调民族共同体的恒久性与辉煌或者苦难的经历。

关键词：民族；民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叙事；历史

引言

大约从 19 世纪中期开始，民族主义在世界舞台上成为一股思潮和社会政治运动。在此之前，由于海外殖民地贸易兴起刺激了资本原始积累，工业化开始在西欧一些社会中启动，社会上也出现相应的要求。这些要求导致了原先农业国家状态下的异质性社会向同质性社会的过渡。国家内部权力日益集中，出现了对社会的掌控前所未有的中央集权。社会同质化必然导致在国家社会中浮现出那种原先不见于农业社会的大体一致的文化面貌和社会心态——教育日益普及和传媒业或传媒资本主义的出现，使人们共享许多信息，这也会导致人们对一些事件的发生有大体相近的反应。在这样的条件下，民族（nation）也就渐渐地步入历史舞台。³ 所以哲学家和人类学家盖尔纳（Ernest Gellner）才说，现有国家后有民族。事实上，民族形成和民族主义运动也存在着不同的形式，也并非所有的民族都产生在国家之后，问题在于，一个民族之所以为民族的资格及其正当性，并非由民族成员自身说了算（尽管必须自我界定^[2]）而是取决于业已存在的其他民族国家是否认可。

民族主义长期以来都不是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人类学家所关心的更多的是地方上的群体，无论这样的群体如何改头换面——种族、部落或者族群以及那些相对于现代社会显得更为保守，或者更似“村落”的社会。近几十年来，引起人类学者关注民族主义大概至少有以下 5 个因素。其一，人类学家自己的国家有着强烈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separationist movement）；其二，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苏联东欧集团国家解体后所出现的局面。东欧国家在制度转型的过程中，往往试图用民族主义来取代原来的意识形态，抬出历史上英雄人物和民族主义人物叙事来重建民族认同；⁴ 其三，20 世纪 90 年代初发生在巴尔干半岛，以族群和民族为边界的战争。这是一场

¹ 《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20 年第 6 期，第 37-49 页。

²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社会文化人类学、政治人类学、全球化。

³ 在此的民族（nation）与我国“56 个民族”意义上的“民族”不同，港台经常用的是“国族”。“民族”乃约定俗成且沿用已久。

⁴ Katherine Verdery, *The Political Lives of Dead Bodies: Reburials: Reburial and Socialist Chang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范可“遗体政治学”见范可《漂泊者的返乡之旅》，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令世人警醒的族群和民族之间的惨烈杀戮。与此同时，有些正在一些亚非拉国家里从事族群性问题田野研究的人类学家，也因此关注民族主义和民族建构问题；其四，20世纪80年代，民族和民族主义研究在其他领域里取得突破性进展，刺激并吸引了人类学家投身这一课题。¹典型的例子便是安德森（Benedict Andersen）和盖尔纳（Ernst Gellner）在1983年分别出版的著作以其独特的视角与分析，激发了许多人类学家研究民族与民族主义的兴趣。这两部充满洞见之作一改原先由政治学家、历史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承包”的领域所欠缺的灵动，在很大程度上以人类学的视角，考察了民族主义崛起和得以持续存在的社会文化时空条件和政治经济学背景，令人耳目一新；其五，全球化。在20世纪80尤其是90年代之后，人口跨国流动，信息四通八达，影响了一些国家之内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活动再度活跃，甚至出现了所谓的“远距离民族主义”（nationalism in distance）——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可以在境外指挥和影响国内的民族主义运动。以下，本文谨就理解民族的几种路径、民族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民族主义的叙事与认同作讨论，以求就正于方家。

一、理解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几种途径

人类学向来以研究小型社会和边远社区著称，地方群体历来是经验研究的焦点所在。如果研究必须考虑到国家，多半也只涉及其中的一小部分。比如国家作为一种外在力量如何影响地方的条件、地方历史构成以及如何影响地方精英和一般人的观念等等。至少到了20世纪的最后20年，对人类学来说，民族主义还是一个新的课题。民族主义运动及其意识形态是一种历史现象，其规模之宏大必然对人类学研究在方法论上有所挑战，人类学者很难将这样的大型社会政治现象置于一个小型的社区来考察，因而人类学家对民族主义的研究自然就有了其他途径。民众传统的社会与文化在民族主义和民族建构运动中迟早会受到影响而发生变化，这正是许多人类学家等兴趣所在。所以人类学家对民族主义的研究会关注官方的民族叙事如何影响地方传统社会文化；或因研究族群性的需要，关注了族群认同（ethnic identity）与民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之间的互动和竞争。而国家社会在民族建构过程中产生大量的文化产品如何影响和渗入传统的社区生活，以及民众又是如何将这些产品与他们生活中的各种仪式性成份结合起来。有些人类学家则研究人们习以为常的历史书写，论证了民族主义者如何为了自身目的而利用历史。

人类学界普遍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即：民族主义是建立在国家的政治边界应该与文化边界重叠这样一种原则之上的情感态度和社会政治运动。民族主义作为情感态度（sentiment）表现为对违背这一原则的愤怒，或者为执行和满足这一原则感到欣慰；民族主义作为一种运动就是使这种情感态度成为现实^[1]。民族主义运动可以因其特点分为西方民族主义（the Western nationalism）和东方民族主义（the Eastern nationalism）两类。这是德国学者汉斯·科恩（Hans Kohn）所作的区分。²前者较为温和，后者往往走向凶狠和排外^[3]。西方民族主义其实并不仅发生在西方工业

2017年版，第230页-239页。

¹ 土耳其学者 Umut Ozkirimli 指出，20世纪80年代是研究民族主义的转折点，该转折点以具有影响力的几部著作作为标志，如：John Armstrong, *Nations Before Nationalism*,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2; Benedict Anderson, *Imag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83; Ernest Gellner, *Nation and National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1983; Eric J. Hobsbawm and Terence Ranger (ed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Anthony Smith, *The Ethnic Origin of Nations*, Oxford: Blackwell, 1986（参见：Umut Ozkirimli, *Theories of Nationalism: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0, p. 2）。

² 汉斯·科恩又称西方民族主义为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liberalist nationalism）或公民民族主义（civic nationalism）；东方民族主义指的是西欧东边的德国和一些斯拉夫国家的民族主义，又称族群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这种民族主义的产生与德意志浪漫主义运动有关系，强调民族之所以为民族是因为其基础是文化。

国家，也发生在美洲殖民地；东方民族主义首先在欧洲内陆出现。两种民族主义都主张主流社会的文化与语言应该在国家版图之内居于绝对的领导地位。

那么，究竟什么是民族（nation）呢？学术界公认这是一个比较难以界定的概念。¹ 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对民族的理解经常是民族主义研究中提及的。他认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斯大林还认为，民族是在资本主义上升阶段形成的^[4]。斯大林的这一定义并未涉及民族建构（nation-building），很容易让人觉得民族是一种水到渠成的结果。马克斯·韦伯从主观情感的一面来的理解民族，但也觉得辨明何为民族并非易事。

“民族”这个概念毫无疑问首先意味着，在面对其他群体时，一个人可以从某些人群中获取一种团结一致的特殊情感。所以，这个概念属于价值观念的范畴。然而，对于如何界定这个群体或者这种团结会带来怎么样的一种行动，却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5][12]}

安德森^{[6][3]}和盖尔纳^[11]也都承认民族难以定义。人类学学者尽管可以指出部落的“无国家社会”（stateless society）性质。然而，在现代社会里，如果一个人不属于某个民族，那将寸步难行。世界上所有的民族都强调自己尊奉的原则是上天所赋予的。然而，民族与国家一样，都是一种偶发的存在。民族和国家的偶发性也有不同。民族主义者相信国家和民族缺一不可，而且命定如此，但国家的出现却可以没有民族的存在。如果国家与民族缺一不可的说法可以成立，那就得有一个前提，即二者同时存在，但条件并非总是如此。有些民族的浮现不仅得不到国家的支持，反而被压制，因为任何主权国家都不希望分裂，都不希望分离成为事实。还有一些群体宣称“民族”，那是出于对自身文化的自豪感。这部分群体的人士当然意识到，作为民族更有尊严。这可能是来自两方面的影响所致。其一，国家民族叙述中的社会达尔文思想；其二，现代民族国家政治诉求经常将“民享”作为号召，如果无视境内其他族群的存在，或对他们的话语权不尊重，迟早会激起境内其他族群关心自身基本权利的认同政治运动^{[7][99]}。

盖尔纳深受韦伯对理性化和现代性诠释的启发指出，工业化导致大量的农村人口流入工业地区在大工业生产中谋取生计。但大工业劳力的准入标准完全与农业不同，那就是需要有起码的识文断字的能力。为此，学校教育开始普及，文凭和证书成为各行各业的准入条件。这么一来就使原来异质性的农业社会渐渐转变为同质性的工业社会，由此而引起的文化整合，为民族主义崛起和民族（nation）形成奠定了基础^[7]。工业化社会的出现带动了教育的日益普及，而社会的同质化则与由主流群体的语言作为通用语言而取代原先形形色色方言相得益彰。来自不同地的民众聚集在工业化的城市区域生活，也要求了解各种信息，传媒业必然随之产生。报纸是现代传媒的最早的形式。报纸的优势在于，它的文字语言都是社会上最多人使用的——原先作为某种方言存在的——语言。当原先可能属于某一地方的方言被社会广为接受，特别是统治者所认可时，这种方言就成为了官方语言。

一旦一个社会有了通用的语言，那就为民族形成打下了基础。安德森把民族定义为一个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将之想象为与生俱来和至上的权力（sovereign）。他强调了语言在型塑民族认同上的重要作用。“想象的共同体”并不意味着“发明共同体”，而是意味着人们把自己定义为一个绝大部份成员都不认识也没见过，甚至从未听说过，而是仅仅在脑海之中的共同体的一分子^{[6][6]}。安德森的关注点不在民族主义的政治性方面，而是在于理解民族国家认同和民族主义情感的力量与坚持从何而来。他认为，人们之所以愿意为民族国家而死，说明了这种力量不同寻常。

西方学界向来以西欧为民族主义发源地。盖尔纳不太关注民族主义在什么地方首先出现，在

¹ 关于民族（nation）作为一个术语的由来，可参考美国社会学家赫克特（Michael Hechter）的简要稽考。参见：（美）赫克特：《遏制民族主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0-13页。

² 转引自（美）赫克特：《遏制民族主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1页。

他讨论中，鲜少提及欧洲以外的其他地方。安德森不一样。他认为首先出现民族主义的区域是美洲大陆。盖尔纳的民族发生学理论建立在逻辑推导和功能主义的基础之上。既然工业化导致了民族主义的产生，那么西欧是民族主义的诞生地是不言自明的。盖尔纳的研究大笔如椽却失之于线条过粗，遭致了许多批评。这些批评中，最为常见的是指责他未能揭示出现民族意识的情感层面^[8]。佩里·安德森（Parry Anderson）就批评盖尔纳的理论无法解释民族主义激情从何而来^[9]。盖尔纳还被批评误读工业化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其一，众多的例子证明许多民族主义运动发生在一些还没有工业化的社会里。民族主义作为一种信条来自德语，但在这一信条出现的 18 和 19 世纪之交，日耳曼社会还没开始工业化；其二，工业化未必需要民族主义。英国和美国是最早工业化和工业化最为成功的国家，但这两个国家在开始和进入工业化后的很长时间内，民族主义一无所知^[10]。总之，不少学者认为，工业化不是民族主义的必备条件。

盖尔纳后来对他的理论作了重新思考，阐述他有关从农业社会向全面工业化社会转型，将民族主义的出现到高涨作了 5 个阶段划分，提供了从非民族主义秩序过渡到民族主义秩序的合理文本。但批评者认为，其适用性有限即便在欧洲也是如此。盖尔纳考虑到了欧洲历史和文化条件上的多样性，将从西到东做了 4 个时区（time zone）的划分，但东端甚至未及俄罗斯而是奥斯曼帝国和哈布斯堡王朝交互影响、争夺的区域。所以基本上还是以欧洲作为思考民族主义运动的中心。4 个时区的划分则力图将各种条件下出现的民族主义运动都考虑在内。¹

安德森主张 18 和 19 世纪之交在南北美洲的殖民地独立运动最早掀起民族主义浪潮。他以一种将心比心的方式体会人在旅行穿梭中与他者相遇时产生的“边界”之感，这种感受成为他考虑民族意识产生的出发点。民族得以产生和存在也需要他者。安德森引用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有关“旅行”（journey）使人感受到在时间之间、地方之间、身份之间产生不同意义的经验时指出，欧裔定居者即克里奥尔人（Creoles）因出生于殖民地，² 他们的社会政治流动受到限制。凡不是在本土出生的西班牙人身份低于西班牙本土出生者。这种歧视在克里奥尔人回到祖国之后有深切的体会。而这样的歧视与殖民地出生身份重叠，使克里奥尔人产生一种“束缚的朝圣”（cramped pilgrimage）的共同经验。这就使这些被宗主国统治阶层歧视的旅伴们最终将自己出生的殖民地想象为自己的祖国，同时也会将被殖民者视为同一民族^{[6]53-65}。安德森告诉我们，为什么民族主义首先在美洲出现，当地的民族主义运动又如何从殖民地的上层精英开始。但是，民族意识广为扩散则是在印刷资本主义（print capitalism）崛起之后。

安德森认为，印刷资本主义对共同体意识的产生是很重要的。这也不难理解，当人们互相能读懂彼此所读之物，会有一种感觉——“嘿，我们是一伙的”。共同体（community）这个概念的社会学意义应该是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首创的。我们可以将之简要理解，所谓共同体就是“熟人社会”（face to face society）。熟人社会的成员彼此有种认同感，这种认同感可能来自血缘、地缘、宗教，或者兼而有之。通过印刷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情感纽带则把不认识、没见过，甚至没听说过，但说同一种语言的人维系在一起。试想，当一个人离乡在外，终日因人生地不熟而沉溺于怀乡的离愁别绪当中，有一天突然感觉周围的人都因为了解同一件并非发生在身边的事所激动、震撼时，进而发现发生异乡之事被如此之多的人所知道，竟是因为读懂同一份报纸！这时产生一种亲近感是不言而喻的。这就如同一个人在举目无亲的异乡突然遇到家乡的熟人的那种感觉。

安德森非常细腻地从心理学和人类学的视角分析民族意识的情感基础。以上提及他对克里奥

¹ Ernest Gallner, *Nationalism*,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97.

² 克里奥尔人在 16~18 世纪时本来是指出生于美洲而双亲是西班牙或者葡萄牙人的白种人，以区别于生于西班牙而迁往美洲的移民。这个名称后来有了各种意义，因地区不同而有所不同甚或矛盾。在殖民地时期的美洲，克里奥尔人一般被排斥于教会和国家的高级机构之外，虽然法律上西班牙人和克里奥尔人是平等的。

尔人的“束缚的朝圣”的解读，也是从情感上分析了克里奥尔人如何因为感受到出生地不同所导致的在身份和社会流动上所受的制约，而在情感上日益疏离他们原先认定的“祖国”，转而将殖民地当作自己父母之邦的心路历程。如果说安德森所论及的是殖民地上层精英滋生民族意识的心理过程，那么，盖尔纳（尽管他的理论在细节上经常不可推敲）则从整个社会结构因为工业化所带来的巨变，支持了安德森印刷资本主义的基本假设——工业化带来的识字率的提高成为现实，读报的人多了起来，信息也就不再限制在狭小的地方或者区域空间里，而是极大地拓展，这就为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盖尔纳和安德森的理论虽有所区别但在许多地方是兼容的。他们都认为民族的出现并非历史的必然延续——因为地球上的民族仅仅占有潜力成为民族的群体中的一小部分；主张民族是建构的，是寻求在文化群体与国家之间锻造炼接的结果。盖尔纳和安德森两人都设想抽象的、建立在不同秩序上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全然不同于传统的地缘与血缘——也就是建立在差序格局基础上的共同体。安德森想要解释为什么民族主义是“异常的事物”（anomaly）。根据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现代化理论，民族主义不应该在个体主义的后启蒙世界存活。民族主义的“原生忠诚”（primordial loyalties）和基于共同起源和文化之上的团结根本与后启蒙时代的精神不符。他认为，民族主义之所以还有强大生命力的原因乃在于，“民族性”（nation-ness）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政治生活里最主要的合法价值^{[6]3}。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只有民族才拥有话语权。

盖尔纳的学生，以研究民族主义闻名于世的英国历史学家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Smith）是一位同样在20世纪80年代研究民族主义的高潮中作出贡献的优秀学者。他的重要著作《民族及其族源》强调民族建构的历史延续性（historical continuity），但这并不意味着历史上的族群一定会成为现代民族。现代民族的产生有特定的条件，但是在民族建构的过程中，民族主义者往往会发掘历史资源来为建构中的民族的合法性提供支持。¹史密斯提出自己的核心概念——ethnic，我们姑且将之翻译为“古代民族”。这个概念不同于族群。人类学谈论的族群，其形成与存在可以是国家“不在场”的。在这个意义上，族群性所强调的是一种社会关系，尽管在国家的语境里，促成族群意识的浮现可能还会有来自其他的主体的影响²史密斯的“古代民族”所指的“不仅是有着共同称谓、血统神话、历史、文化和地域的组织的人口范畴，而且还是明确的认同感和团结感的共同体。这种认同感和团结感经常见之于制度性的慈善表达（institutional philanthropic expression）”（笔者译）。³

在史密斯看来，能够被认为是“古代民族”或者“族群共同体”（ethnic community）的群体，必须满足这些条件：必须有强烈的从属感和活跃的团结感，当处于紧张和危险状态时，能超越共同体内部存在的阶级、虚拟或地方的区隔。在实践中，活跃的团结感和各种形式的合作有如晚近完全成熟的被认可的民族。史密斯论及真正意义上的古代民族时指出，其存在还有赖于群体内受过教育的阶层。只有他们才能使团结感和共同体有生命力，因为他们才能使这类感觉传导给共同体之内的其他阶层和其他地区。而且，只要存在着对这种族群共同体的感觉，周期性再现的族群团结和制度性的合作有足够的力量与深度来化解其他种类的忠诚——尤其在面临来自敌人威胁和其他危险的时候。⁴

与盖尔纳和安德森不同，史密斯强调历史的连续性（historical continuity），但这不是历史必然性——并不是所有的历史上的族群共同体都能步入世界的民族之林。盖尔纳和安德森虽然在一定的意义上揭示了历史的非连续性，但强调了一定的条件下会促成民族主义的兴起，所以他们主

¹ 参见 Anthony D. Smith, *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Oxford(UK) and Cambridge(USA): Blackwell, 1995[1986].

² 参见拙著《理解族别——比较的视野》，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9年版，第37-50页；拙文：“何以边为：巴特族群理论的启迪”，《学术月刊》，2017年第七期，第99-110页。

³ Anthony D. Smith, *Ethnic Origins*, p. 29.

⁴ Anthony D. Smith, *Ethnic Origins*, p. 30.

张的历史非连续性也非无源之水。但我们确实不能忽视导致历史发展路径选择的偶然性因素（contingency factors）。

人类学对族群边界和认同过程的研究可以帮助理解安德森的问题意识。对族群认同形成和“边界维护”（boundary maintenance）的研究表明，族群认同总是在充满起伏、不断生变的过程中彰显其重要性。这在资源争夺、话语权争夺和族群边界遭到持续性威胁的条件下，具有团结成员的重要意义和价值。民族主义运动通常发生在具有国际意义的环境里。在这里，民族边界（national boundary）取代了族群边界（ethnic boundary）。民族主义运动之所以表现为寻求独立建立民族国家乃国际政治秩序所使然。成为一个民族可以自我认定，但必须得到外界认可才真正有效。

二、民族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

民族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有着强烈的亲和性。影响社会达尔文主义形成的一些思想因子，在达尔文进化论问世之前就已经存在于欧洲社会。启蒙主义思想家就相信社会总是往前发展，尽管可能会有反复。1859年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之后，社会上对达尔文提出的演化机制错误地理解为“适者生存”，原先已经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那种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仿佛寻得其合法性，遂有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之名。其实达尔文所认为的进化的机制是“自然选择”，所以演化是没有方向的。演化在达尔文的眼里不一定带来“进步”——这是启蒙运动之后的三大概念之一（另两个是科学和理性）。如果说包括人类学在内的19世纪欧洲社会人文各界在任何程度上受到当时科学界的进化观的影响，那就是拉马克（Jean-Baptiste Lamarck）的“用进废退”理论（theory of use and disuse）^[11]。

拉马克的学说包含了“进步”的观念，这才是19世纪的民族主义者所需要的。但是，达尔文学说在社会所引起的巨大轰动，以及所形成的氛围，无疑影响了民族主义或者帝国主义的雄心和野心。应当看到，为了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许多民族主义就是以帝国主义为榜样。孙中山1924年1月到8月关于三民主义的系列演讲中，表明他的态度：对中国而言，民族主义就是救国主义。孙中山显然受到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他在批判列强视中国为刀俎鱼肉的同时，也不忘以英美等世界强权为榜样。换言之，孙中山寄望于民族主义帮助中国摆脱列强的控制，又期待中国有朝一日可以同列强比肩——而这也有赖于民族主义^[12]。有趣的是，所有当年的民族主义者或者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可能都没有意识到，达尔文的学说与他们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理念之间存在着相悖之处。套用出生南非的人类学家库柏批评古典进化论人类学的话：“达尔文的凯歌催生了一种非常不达尔文的人类学。”^[112]我们也可以说达尔文的凯歌催生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社会达尔文主义核心就是一种亮肌肉的思想意识形态。为了跻身世界之林，19世纪和20世纪的民族主义者也奉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圭臬。

因其如此，民族主义在19世纪下半叶已经蜕变为一种强权政治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与达尔文主义甚至帝国主义之间的互联性和亲和性导致了民族主义运动在19世纪下半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之前，形成了第一次高潮——尽管安德森讥讽将第一波民族主义浪潮定在西欧是一种“地方主义”偏见。但如果从对世界格局和人们观念的冲击来看，在欧洲出现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影响力，在短程的意义上，远远强于18世纪下半叶和19世纪上半叶美洲发生的民族主义运动。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则未必，因为美国在19世纪下半叶崛起也是美洲民族主义运动的一个后果。在欧洲，民族主义则成了点燃第一次世界大战战火的导火索。

这一波民族主义运动在盖尔纳的概念中涵盖了几个时区。除了英法之外，主要思想源头来自德国。学术界因其精神原则冠之以“族群民族主义”，也就是科恩所谓的东方民族主义。族群在

此指的是有着相同文化背景的群体，并不是所有族群民族主义运动都燃起战火。有些政治单元或者传统国家在转型为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平稳过渡，特别是那些原先独立的，与邻国没有边界或者其他纠纷的政治单元。德国和受到德意志思想传统的国家强烈影响的国家，它们的民族主义运动与英法和美洲的民族主义表现得不太相同，但同样具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色彩和逻辑，相信国家必须建立在统一文化的基础之上，而统一文化的形成首先靠的是说和写同一种语言，而这些操同样语言的人们就是民族，国家只有与民族结合在一起才具有竞争力。族群民族主义往往有仇外倾向出现。仇外是民族主义者进行社会动员必不可少的养分。德国的民族主义所愤怒的对象是法国，因为他们觉得日耳曼的人文成就和自我意识绝不在法兰西人之下。如果“仇外”是一个过于严厉的措辞，我们可以用靶子或者出气筒来取而代之。换言之，今天，一提起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固然让人感到十分血腥。但事实上未必尽然如此。可总得有合法的出气对象，于是苏格兰的民族主义运动的靶子是大英帝国，尤其是英格兰；巴斯克人的对象则是西班牙和法国；魁北克的对象则是英语为母语的加拿大人，凡此种种。

由于民族主义运动始终是世界不安情绪的由来之一，人们对民族主义运动所带来的另一面却缺乏足够的关注。这可能是对民族主义运动有种想当然的负面预设所使然。没错，民族主义运动确实给人类带来许多身心创伤和社会创伤——时至今日，许多民族之间仍然视如寇讎。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这个世界经历了多少次民族或者种族仇杀？从巴尔干半岛的前南斯拉夫国家，到非洲的索马里、卢旺达、布隆迪、南苏丹，甚至缅甸。这些残酷而血腥的战争暴行和公开的反人类行为，有哪一次与民族主义没有关系？今天的许多民族主义者或者民族分离主义者甚至不惜以恐怖主义活动来表达他们的所谓“民族诉求”，如曾经很活跃的北爱尔兰恐怖组织——北爱尔兰共和军、斯里兰卡的泰米尔猛虎组织、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中的若干派别等。这些民族主义者是在与全人类为敌。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低估民族主义为丰富人类文化宝库所做的巨大贡献。民族主义者在历史上并不全是持枪进行武装斗争战士，他们当中更多的是用自己的专长为民族独立做贡献者，以自身的才华来表现民族的诉求。这样的诉求形式在挣脱帝国主义列强桎梏的过程中，起了鼓舞民心、激励民众的作用。由于族群民族主义是以原先族群文化作为基础的民族主义运动；是一种在共同文化之上寻求建国的过程，为了表达这样的诉求的合法性，围绕这样的主题在民族主义运动的过程中，许多国家都涌现了大量的音乐、美术、文学作品。

安东尼·史密斯指出，在民族主义运动中，自然景观和历史都成为民族主义叙事的载体^[13]。值得注意的是，民族主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宣泄可以通过对民族主义者所期待建国的国土山川的讴歌和礼赞来表达——这样的做法在世界上许多民族国家的叙事当中都可以看到。最典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原则在民族叙事当中就是对历史战胜外来入侵者的主要人物以歌颂和树碑立传，那些以弱胜强的军事首脑往往成为国家的民族英雄，他们代表着民族自强的灵魂。而在这些叙事当中，宏大和悲壮也就成为主旋律。这种大的场景的展现呈现的其实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即屹立于世界之林是一场竞争，只有强者才能实现这一愿景。

三、叙事与认同——传统、先贤祠、纪念物、地图、博物馆

无论何种民族主义都终会走到强调民族应该由国家版图内最强大的“族群”文化来作为底盘，但在许多政治单元的社会里，这一文化——盖尔纳称之为“高级文化”（high culture）——却是在国家的“干预”下才“创造”出来的。科恩所谓的西方民族主义的出现，最初应不是国家的蓄意而为；而最终走上国家建设的民族主义（nation building nationalism）之路，¹完全可能是

¹ 这是赫克特提出的概念，也有称之为“官方民族主义”（official nationalism）者，即官方通过各种治理和宣传手段来实现国家社会整合的过程。具体手段可以通过学校教育和本章所描述的各种方式来实现。参见（美）赫克特：

因为政权认识到，共享文化或者共享某种价值和精神原则对于凝聚民心、建构民族认同的必要性，进而顺势而为的结果。无论如何，正如盖尔纳和安德森都指出，这些东西的出现是一种偶然，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条件（工业化）和技术创新（印刷资本主义）有关。理论而言，东方民族主义即族群民族主义则反是。东方民族主义强调共享语言和文化的人群应该是一个民族，拥有自己的国家。这一表述的原型来自德国古典哲学家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

赫尔德是一位地理环境决定论者，活跃于 18 世纪下半叶和 19 世纪初年。他宣称，生活在同一种地理环境状况下的民众，拥有自己的语言文化，理应是一个民族而拥有自己的国家。这一雄辩的“民族性”表述令人联想到私有财产观念——你拥有什么决定了你的身份地位。因而赫尔德不啻是在说，正因为我们“拥有”自己的地理环境、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文化，所以我们应该是一个拥有自己的国家的民族。赫尔德的这一表述 19 世纪的欧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多少将民族主义的本质理论化^{[6]68}。赫尔德的这一思想之所以能成为 19 世纪欧洲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基本诉求和形塑人们对民族的认知，与当年德国思想界在欧洲的影响力有关系。德国统一就是建立在这样的民族认知的思想基础之上。而到了 19、20 世纪之交，尤其在“一战”前后，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强调“民族自决”（self-determination），民族国家成为了国际政治秩序的基本单位。这就是说，只有民族国家才有资格在国际地缘政治上置喙。这些都是民族主义运动从 19 世纪末期开始风起云涌的思想和历史背景。

在 18 世纪和 19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世界霸权主要掌握在英国手里，但是欧洲的文化霸权却是法国甚于英国。大部分的欧洲大陆国家王室贵族在生活上都以法国上流社会为参照，生活作派法式贵族化、讲法语、用法文写作，似乎处处以显示其“法国性”为荣。法国的王宫贵族们自认为自身的文化是文明的，具有普世意义。而在 19 世纪，德国依然在经济和政治上落后，而且也没统一，全国由许多大小不一的政治单元所组成。其中，以普鲁士实力最强大，但也依然是个农业国家。虽然经济政治不如人，但教育和文化却不落人后，在思想界更是群星璀璨。虽然直到 1871 年德国才实现第一次统一，但德意志土地上的人文成就绝不逊色于强大的英国和法国，而且其思想界很早便有德意志自我意识。

赫尔德关于文化的许多论述就是出于对法国霸权所宣扬的“文明”的不满。在德意志要求统一的上升时期，赫尔德的理念自然广泛传播，尤其是在一些深受 18 世纪以降德意志浪漫主义运动浸染的中欧和东欧国家。1871 年，德国在历史上首次统一。然而，在这段时间前后，受德意志思想文化影响的许多国家也纷纷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民族主义运动在这些国家中，多以文化民族主义为先导，大量的作家文人强调用自己的母语写作，俄罗斯的伟大诗人普希金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而在当时，俄罗斯文人以使用法语为时尚。普希金是否为倡导母语写作的第一位俄罗斯人不得而知，但他的影响一定是最大的。

学术界将通过弘扬自身文化，展现和建构文化传统的文人、艺术家称为文化民族主义者（cultural nationalist）。他们在民族统一的过程的主要工作是发掘所谓民族文化的遗产和精髓，他们相信这些精髓隐藏在历来不为关注的民众生活当中。他们的实践甚至催生了民俗学（folklore）的诞生。今天世界上许多人颇为享受的一些电影和故事，如《指环王》《阿凡达》等，都是民族主义的时代发掘出来的北欧的民间传说。而全世界人们耳熟能详的格林兄弟故事和安徒生童话也同样如此。大量的有闲阶级认为上不了台面的东西在民族主义运动的氛围中被发掘出来，并经过再创作而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在整个 19 世纪的民族主义运动和民族建构过程中，收集有关所谓的前现代（premodern）的各种口头文献和物质资料成为定义现代民族疆界（national boundaries）和书写和展现民族历史的正当性活动。这方面的工作能令民族主义者沉醉其间，也是因赫尔德关于“民族文化”（national culture）理论的影响。赫尔德认为，底层阶级口头传承是

《遏制民族主义》第 74-81 页；Benedict Anderson, *Imaged Communities*, p. 83-112, 163-206.

民族文化的代表。许多国家的民族主义者和文化人都受其影响投入收集研究各种口头文学、歌谣、民俗、民间故事、话本、唱腔的工作中。芬兰学者安托宁（Pertti Anttonen）指出，在芬兰民族主义运动中，芬兰一些学者之所以深入东部边远地区的村庄和森林地区如卡累利阿和英格里阿（Karelia and Ingria）收集不识字的边缘人群的口头文学，就是因为他们都承担着强烈的民族政治动机和民族主义目的^[14]。

民俗学在以德国为中心的中、东欧甚至北欧诞生之后，很快也传播到其他大洲。比如中国和日本在走向现代国家的过程中，都出现了民俗学研究。民俗学家相信国家或者民族文化的根子应该在民间生活里；精英文化即贵族或者达官贵人所代表的官方文化是霸权性文化（hegemonic culture）即主导性文化，它仅仅属于社会中的一小部分人，并不代表民众，因而是腐朽的。而占人口绝大部分的普通民众的文化即民俗文化（folk culture）和生活传统，完全为统治阶级所无视，完全不见之于主流叙事当中。这种情况与民族主义时代之前的中欧和东欧的情况相似——教会和王室贵族以及达官贵人们控制了社会。拉丁文依然在天主教中沿用，而王室和上流社会以使用法语为时尚。拉丁文在当时显然已经走向衰亡，仅在教会中一息尚存。像这样毫无生命力然而却在语言权力关系中居于顶端的语言，在民族主义运动中自然成为挑战的对象。法语不仅是外来的，而且仅在王室贵族中流行。这种情形在民族主义时代也直接刺激了民族意识的产生。在德国和其他中东欧、北欧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中，许多民族主义者具有强烈民族自觉，他们提倡使用“方言”（vernacular language——相对于拉丁语）——也就是本民族语言进行书写和创作。这一转变始于18世纪的启蒙主义者——卢梭和伏尔泰等人都是用法语写作，但随着法国大革命给法兰西带来的变化，法语成为了欧洲其他国家上流社会的时尚。但在19世纪下半叶的民族主义运动高潮中，又成为其他后起的民族国家予以摆脱的外来语言。¹

在中国，民俗学运动的先驱如容肇祖、顾颉刚、常惠、姜子匡等人，他们到民众中去做了大量的采风——有些类似人类学的田野工作，但更多地强调对民间各类口头文学的调查。北京大学在1922年12月创办《歌谣周刊》，发表的歌谣除新疆、西藏、热河外各地都有，其内容以反映妇女痛苦生活的歌谣和儿歌为多，也有不少情歌、仪式音乐（喜歌、丧歌等），还有一些时政歌谣以及各好民间的劳动号子和一些劳动职业群体独特的曲子曲调等；形式上以只说不唱的民谣和曲调自由的山歌、小调为主。这些当年都纳入“国粹”的范畴，由此足见当时民族主义的思想背景，而当时我国的这一背景又有着另外的说法，即“新文化运动”。无论是国粹或者新文化运动，在观念和实践中，都有欧陆族群民族主义影响下兴起的民俗研究的影子。20世纪前30多年间，我国民俗学家深入生活，写下大量有关民俗民风的调查报告、专著、论文。从他们的发表的著作来看，显然也受到日本民俗学之父柳田国男的影响。在一定的程度上，他们不仅在工作方法上，而且在精神上也秉承了柳田国男。鉴于19世纪也是日本的民族主义时代，柳田国男受到欧陆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如果具体考虑不同国家的历史上的现实条件，民族主义也未必全无积极意义。人们现在会认为民族主义都是仇外的。然而，美国社会学家赫克特却认为，民族主义最初是包容的。民族主义

¹ 赫克特认为，法国在大革命之前与其他国家一样，实行“间接统治”。王室对地方的控制表现在税收制度和设计上。国王通过监督官（intendants）和王室代理人来征集税赋。但在农村，这些主要通过地方政权来执行，主要是贵族和牧师。这些人小心地维护自己的特权，避免得罪巴黎而受其干扰。只要这种中央与地方的交易关系处于稳定状态，一般不会出现问题。但随着中央对权力和资源需求的膨胀，最终引发了乡村贵族和农民的反弹。著名历史社会学家查尔斯·梯利（Charles Tilly）就认为，18世纪末期发生的法国大革命，起因就是国王要求增加税赋的行动所导致的后果。大革命之后，随着地方贵族的位置被资产阶级组成的国民自卫军所取代之后，这些人也开始抵制中央的控制。中央不得不采取策略，进一步加强自己的权力。除了划分新的层级性的行政单元之外，还在税务、司法、公共工程和治安等方面实施了改革，并通过军队的掌控，国家牢牢地掌控了地方政府。这些改革将资源大大地集中到了巴黎，逐渐降低了公民对地方政权的依赖程度，使法国当时发展成为一个非常成功的国家。参见（美）赫克特《遏制民族主义》，第69页。

始于法国童话“睡美人”(Sleeping Beauty),代表着普通民众战胜了旧制度的腐败君主制势力,其标志就是法国大革命。进入20世纪之后,民族主义运动逐渐变成鼓动仇外情绪,甚至发动种族灭绝(genocide)的社会运动^[516]。20世纪以降的民族主义运动一般都有现实的,或者假想的敌对民族。发生在清末民初的中国民族主义运动所针对的敌人起初满清,所以最初口号是“反清复明”,继而“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并以此为感召。当下苏格兰民族主义者的分离运动所针对的当然是英格兰。而库尔德人的民族独立运动则是要求从伊朗、伊拉克等国中分离出来,建立起自己的民族国家。加拿大魁北克也存在着分离的力量,要求从讲英语的加拿大脱离出来,建立魁北克国家。巴斯克民族主义也同样如此,要求从有关国家分离出来成立自己的民族国家。这些要求分离的民族主义宣传往往强调自身的历史渊源和包括语言、宗教在内的文化独特性。

民族主义运动所强调的文化独特性涉及许多方面。许多具有民族独立意识的艺术家、作家本身的创作就会按这样的思路进行创作。更有许多则因为在创作当中大量地采用了民间素材,他们的作品因此也会被民族主义者所利用来鼓舞民众和当作民族叙事表述。当今音乐学界将部分古典音乐称为“民族乐派”道理就在于此。民族乐派的作曲家们活跃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上半叶,而且几乎无一例外地来自北欧和东欧的音乐家。他们当中的有些人甚至被认为是所在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驱或者积极参与者。芬兰的西贝柳斯(Jean Sibelius)就是典型的例子。他的交响诗《芬兰颂》(Finlandia)气势恢宏,真切而有力讴歌千湖之国雄浑的自然景观,表达芬兰摆脱枷锁的期盼。惧于这部作品所产生的连带效果,沙皇俄国竟然下令禁止演奏这一作品。捷克的斯美塔那和德沃夏克、挪威的格里格以及俄罗斯的几位作曲家如格林卡、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等人,也都被所在国家公推为民族音乐家,他们的作品都起了提振民族精神的作用。肖邦则是另外一种杰出的例子。他的作品未必尽可归为民族乐派,但还是大量地运用了波兰民间的元素。而且他以他的爱国主义精神激励了他视为祖国的波兰(他的父亲是法国人)同胞,为波兰摆脱强权瓜分重新统一做斗争。肖邦也因此一直在波兰的民族叙事中占有重要地位。

至于其他表现传统民族风格和民族特色的各种象征性的东西,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认为都是“发明”的。因为许多文化民族主义者的创作过程都要发掘传统来打造本民族的特点与恒久性。吉登斯说,许多所谓的传统的东西最多不过是过去两个世纪多,甚至更为晚近的产物。吉登斯和霍布斯鲍姆都提到的被当作苏格兰民族象征,男性穿的花格子呢裙(kilt)和风笛(bagpipe)就是如此。霍布斯鲍姆与兰杰尔(Terence Ranger)合编的《传统发明》的书中还有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类似例子^[15]。吉登斯说,苏格兰男性的花格呢裙是工业革命的产物,而且是英格兰工业家托马斯·罗林森(Thomas Rawlinson)在18世纪发明的,并用它取代了高地苏格兰男人的裙子以便于工作。这种短裙成为苏格兰民族服装和文化标志是后来的事情。苏格兰人中的大部分是低地苏格兰人,他们认为高地人的短裙是野蛮人的装束,而且引以为耻。用于表示不同氏族的花格图案,则是一位维多利亚时代(1837-1901)的裁缝设计的,他显然看到了商机。吉登斯还提及大英帝国如何为印度寻找文化遗产的趣事。在1860年之前,印度士兵的军服与英国军人无异,都是西方制服。但此后则让印度士兵使用缠头、肩带(sashes)和短袍(tunics),以示其“本真”^{[16]54-55}。“他们所发明的或者半发明的一些传统在这个国家的今天依然持续着,虽然后来自然地淘汰了一些”^{[16]55-56},吉登斯如是说。

在民族主义运动或者民族建构过程中最为醒目的是构建各种纪念物缅怀为国家为民族做出牺牲的仁人志士。这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这些纪念物包括纪念碑、各种战争和英雄和著名人物的街头雕塑、衣冠冢、无名烈士墓或者无名烈士纪念碑、先贤祠、忠烈祠之类的建筑。很多在这些物体面前的活动都是仪式性的。仪式对于加强人们的团结,强化某种情感行之有效。这种原先具有宗教信仰意义或者神秘色彩的社会团结行动,到了民族主义时代自然被用来强化人们的民族归属,并在此过程中,使人发生一种对民族国家崇拜的情感联结。所有国家都有诸如民族解放纪

念碑之类的方尖碑建筑，都有各种纪念馆和博物馆展现官方口径的民族国家历史。安德森说，博物馆和想象共同体的博物馆化（museumizing），二者都是强烈政治化的（profoundly political）。他指出，东南亚国家出现大量的博物馆是活生生的政治继承过程，理解这种现象需要考虑到 19 世纪新奇的殖民地考古学。因为这种考古学，这些博物馆才可能存在^{[6]178}。换言之，这是东南亚新兴国家为了自己的想象共同体必须缔造一种源远流长的国家存在形象，而与这样目的完全没有关系的殖民地考古资料为新兴国家的民族叙事提供了这一方面的素材，而对这些素材的解释口径是官方的。

无名烈士纪念碑、衣冠冢经常是民族建构不可或缺之物。没有什么比衣冠冢和无名战士纪念碑在现代民族主义文化中更引人注目了。安德森认为，围绕这些纪念性建筑的各种纪念仪式需要它们是空的，或者不知道里面是谁，这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古希腊有衣冠冢，但是这是因为各种原因无法找到死者遗体^{[6]9}。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有公认的世界同类型建筑最出色的国家战争纪念馆（Australian War Memorials）——墨尔本也有类似纪念建筑。战争纪念馆纪念历史上参加战争的澳洲烈士。重要的是，这些战争除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外，还包括了近代由英美主导的多次战争。在这些战争中，澳大利亚先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单元，后来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参战的。这象征着澳大利亚从殖民地国家走向独立的民族国家的过程，因而成为了澳大利亚民族国家叙事不可或缺的重要表述：澳大利亚历来都是以主权国家即民族国家而不是以殖民地国家的性质参战（尽管未必尽然如此）。战争纪念馆的象征意义如同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都具有民族认同建构和凝聚民心的民族共同体建设意义。

法国巴黎的先贤祠则是另外一种类型的现代民族表述，是法兰西共和宪法的具体体现。先贤祠内目前葬有 72 位在各方面为法国作出贡献的人物。从卢梭、伏尔泰到居里夫妇和大仲马。除了大仲马之外，文学家还有两位——雨果和左拉。大仲马虽然非常著名，但毕竟是通俗小说家，其文学成就在璀璨的法兰西文学殿堂里根本排不上号。他的遗体直到 2006 年才进入先贤祠，之所以如此当然更多的是政治上的考量。大仲马黑白混血，一生中不断受到种族主义者的骚扰，但是他政治立场鲜明，终身主张共和制。当代法国政府为了体现法兰西民族的多元构成才将大仲马遗骨移入先贤祠。左拉是意大利血统的法国作家，他入祠的原因政治性甚于其文学成就。左拉卷入法国历史上著名的案件，他写的公开信《我控诉》引起社会强烈共鸣，最终推动了法国当局为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平反^{[7]106-107}。

以上这些例子可以说明民族主义的一个特点，那就是强调贫穷与富裕之间、无产者与资本主义者之间的团结。根据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政治性排斥与包容唯有追随的原则就是民族的边界，而民族在民族主义者眼里则是拥有共同文化的民众（people）^[17]。通过象征的方式锻造民族共同体的方式还包括建造博物馆、绘制地图、唱或者演奏国歌、升国旗、阅兵式、国庆日游行庆典，以及各与民族文化、历史有关的文娱和才艺表演和有关知识竞赛等。原先殖民地宗主国或殖民地国家为了控制和掠夺，延续了帝国绘制地图的传统。绘制地图与人口统计之间有十分重要的关联。在殖民地国家的地图绘制中，通过人口学的三角定位测量将人口统计所作的人口类别标记在地图上，使不同族群的分布地貌得以认识。在东南亚民族主义运动中，地图提供了至少两种想象的条件。

其一，地图为这些人口类别（族群）提供了一种历史纵深感，预示（prefigure）了 20 世纪东南亚的官方民族主义。在一定的意义上，各种地图，尤其是历史地图，催生了民族国家某种政治传记叙事。采纳或者适应这种叙事的民族实际上是从殖民国家那里获得这种“馈赠”^{[6]175}。

其二，第二个条件是地图作为徽标（map-as-logo）。帝国经常在地图上为其殖民地染上颜色。大英帝国在地图上用粉红色（pink-red）表示其殖民地；法国则是蓝紫色（purple-blue）；荷兰用棕黄色。虽然贵为帝国属地，但这样的颜色使殖民地与宗主国判然有别。一旦情况有变，这些如

同拼图上不同颜色块块就可能从地理脉络中成片脱离。总之，地图作为徽标深深地渗入民众——想象共同体变得有形可鉴——终成反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运动诞生之强有力标志^{[6]175}。

大部分国家的博物馆也都在型塑公民的国家或者民族认同建构上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博物馆原先来自于达官贵人或者探险家、收藏家们在一定范围内展示他们的藏品的地方，它可以是专门的建筑，也可以在包含在家庭建筑里，也可以在租来的场地里。博物馆很早就存在，但其大规模兴起则与海外殖民地开拓有关系。当博物馆成为“布尔乔亚们”经常聚集的场所时，就形成了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意义上的“公共空间”（public space）并由此转而成为“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人们经常聚集在这样的空间里议论时政等^[18]。在民族主义风起云涌的时代，一旦民族主义利用这样的空间来展示他们的诉求，博物馆可以成为民族主义运动形塑民众的民族认同的一个阵地。民族国家独立之后，博物馆更是成为用以宣传的工具。不仅博物馆自身，事实上所有的现代国家都有一些将一些公共空间博物馆化。欧洲许多国家都把本国历史上和现代的著名人物包括在文化、科学诸方面和军事上作出贡献者在公共场所立碑竖立起他们的各种塑像，就是例子。在这些雕塑周围或者底座，人们可以看到文字内容，解释为什么要立像纪念雕塑人物。有些国家更是将民族主义武装斗争的武器陈列在城市广场之类公共场所，提醒人们铭记民族国家建立过程的惨烈。

安德森认为，民族国家的许多博物馆和博物馆化的想象（museumizing imagination）具有意味深远的政治意义。他以雅加达的博物馆为例告诉我们，作为新兴民族国家的印尼是从它最近的祖先——荷兰殖民者东印度公司那里习得这种方式。整个东南亚的博物馆表明了一种政治继承的一般过程是如何行动的。而理解这一过程则必须思考使博物馆成为可能的新奇的 19 世纪殖民地考古学（colonial archaeology）。

直到 19 世纪早期，东南亚的殖民统治者对于展示这一区域文明的历史一直缺乏兴趣，直到后来一位叫拉夫勒斯（Thomas Stamford Raffles）的殖民地官员出现才有所改变。拉夫了勒斯对各种文物兴趣浓厚并系统地研究当地历史。东南亚文明如爪哇的博罗布杜神庙遗址、柬埔寨的吴哥（Angkor）等东南亚文明古迹从密集的丛林中显现出来，被发掘、丈量、摄影、重构；被保护起来成为了研究对象，以及展示。殖民考古服务当局（Colonial Archeology Service）成为一个有权势和名声的机构，吸引了一些卓有才华的学者型官员。随着作为殖民地管理的代理者东印度公司的衰弱，以及现代殖民地统治的崛起对殖民地直接掌控，殖民当局的声望也就与其母国的优越声望亲密地联系在一起。殖民当局也在殖民地营建起各种纪念碑、雕塑等。考古学努力投入这方面的建设，帮助在地图上标示这些纪念物件的分布和公共教化等工作。而作出贡献的死者名录也在编纂之中。

博物馆工作在民族国家的建设中起了培养国民民族意识的作用。通过展现民族文化的辉煌或者苦难的过去，博物馆起了不可替代的教化作用，所以正如博物馆的宗旨所宣称的那样，博物馆除了具有收藏和展示陈列的功能之外，还是教育的辅助机构。而地图和统计的结合，例如，语法也如同博物馆那样，型塑了共同体的想象。在殖民主义淡出世界舞台许久之后，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东南亚国家，这些都源于当年殖民地国家对历史和权力的想象^{[6]185}。

总之，通过对历史资料的筛选来编纂民族国家的历史；对祖国山河的礼赞和讴歌来激发群体自豪感，是建立民族认同之主要手段和策略。正因为如此，经常很难把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区分开来。也正因为如此，法国著名学者、民族主义者勒南（Ernst Renan）才认为，所谓民族其实是一种精神原则，它包括两部分：过去和现在；由享有共同记忆所带来的精神遗产，以及一起维护这一精神愿望所构成。¹

¹ 参见 Ernest Renan, "Qu'est-ce qu'une nation" (What is a nation), selected in John Hutchinson and Anthony Smith eds.: Nationalism: Oxford Readers. Oxford and New York, 1991; 勒南的文章最早出版于 1882 年。

四、结论

民族主义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它的出现不是命定的——许多有潜力成为民族的群体并没有成为民族。所以，民族主义的发生有其自身逻辑，如果其他没有成为民族的群体想要成为民族，也得遵循这样的逻辑，但能否成功还得看国际社会是否认可。所以，民族是这样的群体，它必须自我界定之外，还必须要有国际社会的认可和接受。但是国际社会是否认可和一个宣称为民族的群体为民族，又受到其他国际政治或者干脆就是政治经济学原因的制约；也会遭受到强势国家的干预，或者鼓励，或者阻止。

民族主义出现的历史条件涉及到它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全球化之间的互联性（interconnectedness）。这种互联性是“地理大发现”的结果。在紧接着“地理大发现”之后的“大航海时代”里，国际贸易迅猛发展。大西洋上的“三角贸易”（工业产品武器等从西欧到西非交易，再从西非进行奴隶买卖，将黑奴运送到美洲的种植园；再从美洲将原材料产品运送到西欧）刺激和加速了工业化和出现和发展。盖尔纳认为，工业化所强调的标准化和教育普及，是社会由异质性转变为同质性的催化剂，民族意识也就在这当中成长起来。换言之，民族的形成是功能性的。虽然盖尔纳的观点在不少细节上经不起推敲，但不失为一种真知灼见。盖尔纳的主要观点可以与安德森的想象共同体的主要论点相互支持。工业化和工业社会的诞生迎来了印刷资本主义和媒介资本主义的出现，这就为工业化过程出现的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运动的传播奠定了基础，民族共同体的想象也由此建立起来。

民族主义在19世纪下半叶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欧洲社会达到第一个高潮。这与时代思潮——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激励不无关系。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亮肌肉”性质的思想工具。拜其所赐，民族国家终于成为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基本单位。民族作为一种人们共同体的称号登上了人类群体类别的顶端，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成为众多民族主义志士的奋斗目标。

共享记忆与忘却在民族建构中不可或缺。民族主义风起云涌之际，许多激励人心的文本、口号、象征物等已经告诉人们，作为一个民族成员最为重要的就是要有民族意识。民族意识从何而来？当然要通过“教化”，教化如何实现？有赖于各种政治宣传以及各种与文化相关的活动，如建立纪念碑、无名烈士墓、衣冠冢、绘制地图、建立博物馆以及各种历史书写。这就是通过礼赞民族国家历史上的过去、山川河流的壮丽；书写历史上的成就与屈辱和强调民族文化的同一性、国内公民的同一性来实现。这是所有民族国家建立自身民族认同的一般策略和手段。在这方面，文化民族主义者居功至伟，他们以自己充满激情的创作为民族主义运动注入令人血脉贲张的营养素，他们所创作的音乐、美术等文学艺术作品在民族主义运动的时代为建立一般民族的民族意识和认同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以上这些无非说明，民族国家的民族是建构的；民族主义既服务于帝国主义，也可以成为被压迫民族的斗争工具。所有现代民族国家，都必定经历共享记忆与忘却——记忆的是与民族过程有关的伟大成就和伟大实践；记忆历史上所经历的苦难和痛苦。这些都是孵化民族成员之民族意识之关键所在，是为民族认同建构的有效方式。正如费孝通先生在讨论中华民族时指出，中华民族的形成经过了从“自在”到“自为”的过程。中华民族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构成中华民族的中国境内各个民族在长期往来接触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你来我往，我来你往”的关系，但并没有觉得是彼此是相互依靠难以分离的群体。只有在走入近代之后，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等历史条件，才意识到彼此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有了自觉意识^[19]。

在世界上所有民族建构过程中，历史书写、博物馆和纪念馆、纪念碑以及对一些传统的强调

甚至重建、发明，都是必不可少的，这些都是树立国家和民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的必备条件。在这些工作中很多东西必须通过象征来实现。这些象征之物可以来自历史，也可以是民族主义利用历史和民俗来创造。这些对于国家社会可以产生凝聚力，在面对强敌入侵时尤其如此。今日所见之民族主义情绪往往代表着一种排外倾向，这种情感已经与民族主义最初的“睡美人”形式背道而驰。如何在坚持自身民族自豪的同时，又能自觉地摒除排外仇外的消极能量，是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所在，也是研究民族主义的人类学者应予关注的重要问题。

参考文献：

- [1] Gellner E.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 [2] Connor W. “A Nation is a Nation, is a State, is an Ethnic Group is a...”,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1978, 1(4): 379-388.
- [3] Kohn H. *The idea of nationalism: A study in its origins and background*. New York: Collier-Macmillan, 1967[1944].
- [4] 斯大林. 《斯大林全集（1907-1913）》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294.
- [5] 赫克特. 《遏制民族主义》，韩召颖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 [6] Anderson B.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books, 1991[1983].
- [7] 范可，《理解族别——比较的视野》，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8.
- [8] Ozkirimli U. *Theories of nationalism: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0: 140-142.
- [9] Anderson P. *A zone of engagement*. London: Verso, 1992:205.
- [10] Kedourie E. *Nationalism*. Oxford: Blackwell,1994 [1960]: 143.
- [11] Kuper A. *The invention of primitive society: transformations of an illusion*. Psychology Press, 1988.
- [12] 孙中山，民权与国族——孙中山文选[M]. 曹锦清编，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1-66.
- [13] Smith A D. *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Oxford: Blackwell, 1986: 41
- [14] Anttonen P. *Tradition through modernity: postmodernism and the nation-state in folklore scholarship*. Helsinki: Finnish Literature Society. SKS, 2016[2004]: 83.
- [15] Hobsbawm E., & Ranger T. (Ed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 [16] Giddens A. *Runaway world: How globalization is reshaping our lives*. Taylor & Francis, 2003:54-55.
- [17] Eriksen T H.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London: Pluto Press. 1993:102.
- [18] Habermas J.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 MIT press, 1991.
- [19]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1989（4）：1-19.

【论 文】

世界的重塑：从“帝国”到“民族国家”¹

刘德斌²

摘要：1919-2019年，整个世界经历了一个重新塑造的过程，这就是从“帝国”或帝国殖民地向“民族国家”的转变，“民族国家”取代帝国，成为当今世界最主要的组织形式。由于历史背景不同，“民族国家”之间存在极大的差异。从国家构建的角度，循着“已构建国家”、“再构建国家”和“构建中国家”三条线索，分析当今世界三种不同国家的来龙去脉，可以揭开世界的“底色”，展示出一幅不同的国际关系图景。“民族国家”遭遇的挑战，特别是构建中国家的种种遭遇，不仅表明多数“民族国家”徒有其名，而且也表明这个百年之前开始的世界重塑的过程依然没有完成。历史地看，无论帝国还是民族国家，都是人类共同体的组织形式，人类历史实际上也就是是一部不同类型和规模的“共同体”演化的历史。如果把“帝国”和“民族国家”放在人类共同体演进的序列中去考察，就不会在非此即彼之间犹豫徘徊，而为“人类共同体”的实现开辟出新的更多的发展空间。在这其中，中国的历史经验和现实考量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帝国，民族国家，国家构建，冷战，全球化，共同体

现今的世界是一个由“民族国家”构成的世界，“国别”已经成为区分人们的基本标志。但百年之前，世界大部分地区还被大大小小的新老帝国和帝国殖民地所覆盖。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要意义，在于开启了世界从“帝国”向“民族国家”转型的新时代。围绕一战和二战之后新兴国家的建立，也即所谓的“非殖民化”进程，人类上演了一幕幕的悲欢离合。百年之后的世界虽然已经按照“民族国家”的形式重新组合起来，但国家之间的历史背景千差万别，构建过程更不可能整齐划一。

冷战期间的大国纷争和冷战后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拓展，使“民族国家”体制不断遭遇新的挑战。从“帝国”向“民族国家”的转变或许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民族国家”体制又难以应对当今世界所面临的种种新的挑战。在这样一种形势面前，是重新拾取帝国的治理经验，弥补民族国家体制的不足，还是挣脱现实的羁绊，挖掘新的组织方式和治理空间，需要学界进行新的思考和研判。

一、从“帝国”到“民族国家”

帝国是人类几千年文明史上最为重要的组织形式之一，也是当今世界的“来源”，因为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曾经与新老帝国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都从帝国“脱胎”而来。19世纪末20世纪初，除了早期从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帝国统治之下获得独立的拉丁美洲国家外，世界被大大小小的帝国所覆盖。传统观点认为，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以来，民族国家便逐渐取代帝国，成为国际社会最重要的行为体。但事实上，直到19世纪末，除了南北美洲之外，世界大部分地区还是由帝国支配，其中既包括在中东、东欧和中亚争雄几百年的奥斯曼帝国、沙

¹ 本文发表于《外交评论》2019年第6期。

² 作者为吉林大学 公共外交学院 国际关系研究所 教授。

皇俄国和奥匈帝国等老牌帝国，也有英法这种疯狂瓜分世界的新兴帝国，还有羽翼渐丰，刚刚投入海外殖民地竞争的美国和日本。一战之后国际联盟成立之时，仅有 44 个成员国。二战之后联合国成立之初，也仅有 51 个成员国。而到今天，联合国成员国已经达到 193 个。可以说，直到 20 世纪中期，帝国曾与民族国家在世界上长期并存，当今世界多数“民族国家”的历史还不到百年。

世界从帝国向民族国家的转变开始于 19 世纪，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首先是 19 世纪的拉美革命，西班牙、葡萄牙等列强控制下的美洲各殖民地相继爆发了要求独立的革命。在这种背景下，美洲各国最早挣脱了帝国的枷锁，成为民族国家——海地（1804 年）、大哥伦比亚（1810 年）、巴拉圭（1811 年）、委内瑞拉（1811 年）、阿根廷（1816 年）、智利（1818 年）等国相继获得独立。到 19 世纪中期，西属美洲除古巴外全部获得了独立，民族国家在美洲得到了普及。但从 19 世纪中期开始，英法等殖民国家掀起了瓜分世界的浪潮，将几乎整个亚洲、非洲及太平洋地区变成了自身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因此，拉美革命比较“超前”，对欧亚大陆和非洲组织形式的重塑，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

帝国向民族国家转变的第二阶段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在推动帝国向民族国家转型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还在一战期间，俄罗斯相继发生了“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沙皇俄国垮台了，但新兴的苏维埃政权经过一番曲折，不仅成功地巩固了沙皇俄国的版图，而且还有所扩张，并于 1922 年成立了由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南高加索联邦组成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后加盟共和国增加到 15 个。而随着一战的终结，德意志第二帝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相继寿终正寝。德国失去了所有的海外殖民地，奥地利承认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等为独立国家。奥斯曼帝国发生了凯末尔革命，土耳其共和国在战争中赢得了独立地位，但原已失控的奥斯曼帝国彻底摆脱了土耳其人控制，成为英、法等战胜国的委任统治地、保护国或半殖民地。英国控制的势力范围包括塞浦路斯、阿富汗、埃及、苏丹、沙特阿拉伯、伊朗、约旦、巴勒斯坦、伊拉克以及波斯湾沿岸的一些酋长国。法国控制的势力范围包括叙利亚、黎巴嫩以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突尼斯。意大利控制利比亚，西班牙控制摩洛哥部分地区。英、法对其控制范围“分而治之”的策略客观上奠定了现代中东国家的疆界，现代中东就是在奥斯曼帝国解体的基础上诞生的。¹不过，虽然一战后英、法等仍维持着庞大的殖民帝国，但在威尔逊“十四点计划”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民族独立、民族自决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因此可以说，一战拉开了 20 世纪世界从帝国时代向民族国家世界转变的序幕。

帝国向民族国家转变的第三阶段，主要是二战后亚非国家从英法和日本殖民统治下获得独立的过程。1941 年，罗斯福与丘吉尔在《大西洋宪章》中明确表示，战后承认各国人民有权选择其政府的形式，使被武力剥夺主权和自治权的民族重新获得主权与自治。1945 年颁布的《联合国宪章》则明确规定各国主权平等，极大地推动了战后非殖民化浪潮的兴起。与此同时，英、法等国在二战中损失惨重，无力继续维系其庞大的殖民帝国，被迫开始收缩战线，允许其控制下的殖民地获得独立。战后初期，获得独立的国家多集中在亚洲和北非，如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印度、巴基斯坦、突尼斯和利比亚等，它们在原殖民宗主国撤出后直接宣布独立建国。“中东的裂变”在二战后持续展开，从一战之后到二战之后，原来的奥斯曼帝国衍生出十几个国家，从而最终使拥有共同语言、宗教和区域的阿拉伯民族构建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的理想化为泡影。民族独立运动在 20 世纪 60 年代进入高潮。1960 年被称为“非洲年”，这一年共有 17 个非洲国家获得独立。1990 年，非洲最后一个殖民地纳米比亚获得独立，标志着欧洲殖民帝国体系的彻底瓦解。

¹ 参阅西恩·麦克米金：《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姚志宏译，中信出版集团，2018 年。

美苏冷战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文安立在其《全球冷战：美苏对第三世界的干涉和当代世界的形成》中文版序言中做过这样的归纳：第一，美国和苏联的干涉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第三世界各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变迁的国际和国内框架。如果没有冷战，非洲、亚洲，也许还有拉丁美洲，都将完全不同于今日之状况。第二，第三世界的精英中形成的政治方案，往往是对冷战两大对手——美国和苏联——所提供的发展模式的有意识的反应。¹当然，由于截然不同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国情，第三世界国家对美国或苏联模式的照搬难以取得成功，并且往往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第四阶段，也是最后一个阶段始于冷战的终结。1991年苏联解体，分裂为15个国家。1992年南斯拉夫解体，经过一番血腥的“内战”，分裂成5个国家。与此同时，冷战后民族主义思潮再度兴起，一些原属于某一国家内部的族群也开始要求独立，如捷克斯洛伐克分裂为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国家，东帝汶和南苏丹的独立等等，世界上民族国家的数量也随之不断增多，到2013年，联合国会员国数量已达193个。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关于苏联的性质学术界一直存有争议，但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史学界出现了“帝国转向”，形成了新的帝国史流派。这种局面的出现既与西方学术界的影响有关，也适应了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内政外交的需要，这就是为帝国和俄罗斯帝国“正名”：帝国不仅有镇压的功能，也有建设的潜力；俄罗斯不是“民族监狱”，而是一个多种族的超大民族国家。“帝国转向”符合俄罗斯日益抬头的爱国主义和国家主义意识形态，既可以满足俄罗斯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又可为国际外交需要服务，抵御原苏联地区国家的民族主义攻击。²德米特里·特列宁等俄罗斯国际关系学界的知名学者，也从帝国的角度，阐释当今俄罗斯的来龙去脉。³

伴随着从“帝国时代”向“民族国家”的转变，整个世界按照欧洲人发明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重新组织起来了。理论上，每个国家都是“相似的单位”，都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但实际上，由于历史背景、族群构成、宗教信仰和发展水平的不同，国家之间差异极大。根据国家之间不同的历史背景，我们大致可以把它们分成“已构建国家”、“再构建国家”和“构建中国”。 “已构建国家”指的是那些最早按照威斯特伐利亚原则组织起来的欧洲国家。“再构建国家”指的是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在西方的压力之下蜕变成现代民族国家的国家。“构建中国”指的是在沦为殖民地之前，没有长期、稳定的国家传统、在非殖民化运动中赢得民族国家地位的国家。⁴而在“构建中国”内部，情况又不尽相同，还可以进一步细分。无疑，在当今世界，“构建中国”占大多数，有的在国家构建中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如新加坡，但大多数构建中国的国家建设进展缓慢，是当今世界矛盾和冲突的多发地。

二、“民族国家”的遭遇

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世界按照“民族国家”的方式重新组合起来。可以说，当今世界是一个由“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但是，在从帝国时代向民族国家转型的过程中，无论是新兴的民族国家，即再构建国家和构建中国，还是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即已构建国家，都遭遇了严峻的挑战。在应对这些挑战的过程中，一些国家成功了，一些国家失败了。一些国家摆脱了贫困落后的面貌，逐步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一些国家依然在内战、贫困和冲突中踟躇前行。从形式

¹ 文安立：《全球冷战：美苏对第三世界的干涉与当代世界的形成》，牛可等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第2-3页。

² 马龙闪：《俄罗斯史学研究的“帝国热”和帝国史流派——近年俄罗斯史学转型的重大问题》，《历史教学问题》，2018年第2期。

³ 德米特里·特列宁：《帝国之后：21世纪俄罗斯的国家发展与转型》，韩凝译，新华出版社，2015年。

⁴ 刘德斌：《国家类型的划分——拓展国际安全研究的一种思路》，《国际政治研究》，2012年第2期。

上看,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被“民族国家”重新塑造过,但是,在“民族国家”的表象之后,每一个国家的“内涵”和遭遇都不一样。这些不同的遭遇提醒人们在国家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的探索方面,更多地关注多样化和多元化的现实,而不是僵化在一种“定见”之上。

已构建国家在这一百年的时间里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第一次世界大战终结了拿破仑战争之后欧洲历史上的“百年和平”,几百万青年血洒疆场,英法两国经历了德意志这个新兴帝国颠覆欧洲均势、冲击世界霸主的挑战。只是由于美国出手相助,英法等国才赢得一战的胜利,重建欧洲秩序。二十年后,希特勒德国卷土重来,全世界几乎都被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又是得益于美国的帮助和苏联红军的浴血奋战,欧洲大陆才得以逃脱希特勒德国的魔爪,在战争的废墟上重建自己的国家。但是,随着二战的终结,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发源地,作为世界上大部分领土支配者的欧洲“民族帝国”,其支配地位也终结了,欧洲国家沦为世界舞台上的“配角”,欧洲核心区以外的两个超级大国开始支配全世界。欧洲国家被分割为东西两个部分,成为美苏冷战的前沿阵地。苏联凭借经济和军事实力的迅速发展,以及中国等非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在经济、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方面对这些已构建国家形成了挑战。苏联的挑战促进了已构建国家的团结,也促使美国改变对旧大陆的认识以及自身的身份认同,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西方。¹也正是在冷战之中,欧洲国家健全社会福利制度,并组成欧洲经济共同体,保持了对苏联的经济和技术优势,直到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但是,随着冷战后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拓展,越来越多的再构建和构建中国家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越来越多的制造业和服务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欧美国家社会分化加剧,阶级和阶层之间的流动性降低,不平等的社会特征日趋突出,社会冲突加剧,民粹主义兴起,已构建国家的发展模式和社会制度遭遇新的挑战。英国全民公投“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都是已构建国家应对这种挑战的一种反应。

再构建国家,特别是其中的大国,在世界重塑的过程中重新振作起来,正在以“非西方”的形式挑战西方对世界的主导地位。通过向“民族国家”转型,再构建国家重新塑造了自己的国家认同,扭转了19世纪以来的颓势,逐步实现了“崛起”或“复兴”,甚至重新获得了塑造世界的的能力,成为百年世界变局的重要标志。

土耳其和伊朗是中东地区再构建国家的突出代表。一战之后,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革命开启了中东历史的新篇章,在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构建了一个共和国,一个施行政教分离、模仿西方国家体制的新型国家。土耳其在冷战中成为西方阵营的一部分,加入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并一直努力加入欧盟,希望成为欧洲的一部分。冷战终结之后,特别是埃尔多安担任土耳其总理和总统以来,土耳其经济获得了迅速发展,并开始奉行有别于美国和西方的外交政策,成为左右中东局势的重要力量。二战后,伊朗曾经在“白色革命”的道路上“迅跑”,成为继土耳其之后伊斯兰世界“现代化革命”的又一个重要标志。但巴列维政权的专制和腐败导致社会矛盾激化,最后被1979年伊斯兰革命推翻,宗教势力重回伊朗政治。但伊朗革命所建立的“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竟然在美国和西方多年来的孤立与制裁中屹立不倒,并且能够在中东变局中呼风唤雨,的确是个奇迹!2001年遭遇基地组织恐怖袭击之后,美国反恐战争“扩大化”的战略失误不仅使美国深陷中东泥潭,而且使相对平衡的中东力量格局不复存在,伊朗被认为是中东变局的最大“赢家”。不可否认,伊朗经济与社会发展困难重重,体制改革似乎在所难免,但作为再构建国家,伊朗早已摆脱了任由西方大国摆布的命运,并且具备了与大国讨价还价的能力,成为中东和世界舞台上的重要力量。

俄罗斯和日本也是再构建国家。俄罗斯是一个欧洲国家,但又总是作为“被专制的东方毒害过的国家”而被欧洲排除在外。从彼得大帝改革开始,俄罗斯就一直在向“先进的”欧洲学习,但又拒绝接受法国革命开辟的新秩序,成为镇压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宪兵”。一战期间,沙皇

¹ 王立新:《美国国家身份的重塑与“西方”的形成》,《世界历史》,2019年第1期。

俄国深陷困境，1917年发生的“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制度，“十月革命”转向社会主义道路，二战结束之时一跃而为超级大国，与美国和西方博弈近半个世纪。1991年苏联解体，俄罗斯重启沙皇俄国时期的民族认同，并想“重归欧洲大家庭”，甚至成为西方的一部分。但俄罗斯与西方的“蜜月”很快就过去了，俄罗斯依然被视作“徘徊在欧洲大门口的陌生人”。冷战后美国和西方对俄罗斯的“蔑视”反过来“刺激”了俄罗斯重整旗鼓的雄心，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依赖能源输出构建伙伴关系，依赖军事实力抗衡美国压力，依赖外交上的“出奇制胜”，使俄罗斯再次成为美国的主要对手，重归世界大国行列。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曾经策划构建一个从海参崴到里斯本，把俄罗斯和土耳其都纳入其中的更大的“西方”，但美国和欧洲领导人的“战略失误”却成全了一个新的特立独行的对手。与此同时，另一个亚洲的再构建国家日本却成了“西方”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然，早在1870年代明治维新时代，日本就在东亚率先开始了国家的重构进程，并且通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击败了大清帝国和沙皇俄国，跻身于“列强”行列，成了“文明”国家。但日本以拯救亚洲人为幌子，号称要把亚洲从白种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大东亚共荣圈”，实则为变东亚为日本独占殖民地的图谋。日本的行为进一步刺激了东亚其他民族的觉醒，大日本帝国也在二战中灰飞烟灭。战后日本在美国占领军的指导下进行了国家的重构，发动战争的军国主义势力和机制被清除，重新崛起为实现了“民主化”的经济大国，并且被接纳为“西方世界”的“合格”成员。

中国更是一个再构建国家的典型。清末的改革实际上就是在向现代民族国家过渡，辛亥革命终结了中国历史上两千年的“帝制”，抗日战争进一步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辛亥革命之后的军阀混战、国家分裂，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和共产党的励精图治，最后使1949年统一后的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并通过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超过诸多西方发达国家，成为GDP总量排名世界第二的大国，成为挑战美国和西方世界主导地位的“威胁”，甚至中国的“崛起”就被视为西方“衰落”的原因。¹实际上，关于何为“中国”？历史上的中国也是一个“帝国”，还是早熟的现代国家？如果是一个“帝国”，那么中国向“民族国家”的转型究竟起于何时？中国又是一个怎样的“民族国家”？近年来都成了学术界的热点问题。²清代中国曾经被佩雷菲特视为一个“停滞的帝国”，现在又被文安立视为一个“躁动不安的帝国”，特别是1750年之后，斯蒂芬·哈尔西则认为19世纪中期开始，清代中国已经开启了现代国家建构的新时代。³这些问题的讨论，对传统意义上“帝国”和“民族国家”理论提出了挑战，也为中国学界的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提供了新的启迪。

与再构建国家相比，构建中国家在世界的重塑中展现的是另一番图景：一方面是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另一方面是国家构建之中的血雨腥风。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地区又展现出不同的特点。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之间的疆界有着非常明显的人为制造的特点。原本生活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大大小小的2000多个部族，先是被分割在50多个欧洲列强的殖民地或保护地中，而非洲的非殖民化又只能在这种欧洲列强人为制造的“单位”的基础上进行。这样，一个部族被分散在不同的国家，而一个国家又包含了许多不同的部族。因此，无论是国家构建（state-building）还是民族构建（nation-building），几乎都是从零开始。从1910年南非独立开始，到2011年南苏丹获得独立地位，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非殖民化进程几乎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时间。在这期间，特别是美苏冷战期间，撒哈拉以南非洲新兴国家的构建成了东西方博弈的战场，致使有些国家长期陷

¹ 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与西方世界的衰落》，张莉、刘曲译，中信出版社，2010年。

² 参阅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中华书局2011年；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姚大力：《追寻“我们”的根源：中国史上的族群及国家认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

³ 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王国卿等译，生活·读书·三联书店，1993年；Odd Arne Westad, *Restless Empire: China and the World since 1790*, Basic Books, 2012；斯蒂芬·哈尔西：《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1850-1949》，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

入混乱和内战。与非洲国家相比，中东地区的国家构建具有鲜明的民族和宗教特征。除了土耳其、伊朗可以被纳入“再构建国家”的行列外，其他国家多以阿拉伯人为主体的民族，仍处在构建民族认同的艰难进程当中。从地中海沿岸的北非到“肥沃的新月地带”，再到阿拉伯半岛，虽然政治制度差异很大，但基本可归纳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以“阿拉伯民族主义”为号召的共和国，以伊拉克、叙利亚等国为代表，它们曾主张建立统一的阿拉伯人国家，但因领导权纷争和外部干预等而退回到各自的本土立场，并在冷战后陆续陷于内乱和大国入侵。另一种则是君主制或部落联盟国家，如沙特、约旦、阿联酋等，它们在贝都因人社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民族国家”，沙特更是通过原教旨的伊斯兰意识形态赋予国家以合法性。

在有“民族博物馆”之称的东南亚，狭窄、破碎的生存空间中分布着 400 多个民族，其中 100 万人以上的民族就有 24 个。维持多民族国家的艰难，使缅甸、印尼、菲律宾等国在独立后不久就陆续建立威权政府，以强力手段阻止离心势力的出现，甚至通过打压华人等外来移民转移社会不满。越南等中南半岛国家，则在独立后加入了共产主义阵营，其中越南不仅在越南战争中完成了统一，还一度企图建立复合型的印度支那联邦。冷战结束后，东南亚国家陆续进行市场化、民主化改革，并通过东盟内部的区域合作抑制了各国在民族、制度、宗教领域的冲突，国家构建进入了相对平稳的阶段。

现代南亚国家的建立普遍承续英属印度的衣钵，殖民者为其培养出一批本土化的行政、科技、军事精英。然而另一方面，“分而治之”的政策助长了南亚社会的宗教隔阂。与国大党将印度人视为“一个民族”不同，穆斯林联盟则视穆斯林与印度教徒为“两个民族”，而南亚大陆的真实状况是多民族并存。1947 年 8 月，巴基斯坦作为“使穆斯林免于印度教徒多数压迫的避难所”，得以与印度分别建国。可以说，印、巴两国是在“撕裂”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而巴基斯坦又面临着西巴和东巴之间的内部矛盾，并最终被肢解为两个国家，1971 年东巴在印度的支持下独立为孟加拉国。在印度国内，除印度斯坦人外的其他民族也存在不同程度的离心倾向，特别是东北部地区。南亚各国的缔造者曾将世俗主义作为国家的准则，但当国家间的敌意战胜理智，强调国家的宗教属性就成为一种趋势，这又促进了边界两侧的伊斯兰化和印度教民族主义。

拉美国家与前述地区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建国进程早在 19 世纪已经陆续展开，而且多数国家的国民主体是本土化的白人，较少存在挑战国家统一的民族因素。只有在巴拉圭和安第斯国家的一些内陆腹地，存在国家之外的印第安人群体，其关切主要在土地分配、经济增长等方面。而在加勒比海地区，黑色人种与印第安人的普遍混血使各国的民族概念趋于模糊。多数拉美国家建国后，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于政治上的考迪罗制、经济上的大地主制、文化上的天主教会“三位一体”的统治，而外国资本对拉美资源的控制又使本国劳动阶层沦为纯粹的被剥削者。在构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改革、革命与保守三种势力的拉锯成为拉美发展的不同动力。

纵观从帝国时代向民族国家演进的历史进程，我们会发现，构建中国国家遭遇的挑战更为严峻和持久，其中最重要的还是作为民族国家的民族构建问题。实际上，对许多构建中国国家来讲，这个问题到现在也不能说已经解决了。这说明对于当今世界多数国家来讲，“民族国家”是一个名不副实的称号，今后的路还很长。另外，冷战的终结也对构建中国国家构成了强烈的冲击，一批国家陷入“民主化”转型导致的内乱甚至解体的危机之中，沦为所谓的“失败国家”（failed state）、“虚弱国家”（weak state）或“脆弱国家”（fragile state）。脆弱国家的重建一度成为国际组织关心的重大课题，而重建的重点竟被认为是“安全重构、效率重构和合法性重构”，¹ 这几乎等于重新开始国家的建构，同时也说明过去百年这个世界重塑的过程表面上完成了，但实际上还有

¹ 参阅罗伯特·H. 贝茨：《当一切土崩瓦解：20 世纪末非洲国家的失败》，赵玲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5 年；乔治·阿耶提：《解放后的非洲：非洲未来发展的蓝图》，周蕾蕾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5 年；德里克·W·布林克霍夫编著：《冲突后社会的治理：重建脆弱国家》，赵俊、霍龙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5 年；赛斯·D. 卡普兰：《修复脆弱的国家》，颜琳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5 年。

很长的路要走。

三、“帝国”、“民族国家”与人类共同体的演进

从“帝国”向“民族国家”转型的过程，也是世界的组织形式被重新塑造的过程。但“民族国家”体制既要经受“历史的拖累”，容忍“前现代”的国际关系行为体的持续存在，又要因应新时代的挑战，在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条件下，适应国家之间依存关系的发展和人民之间互动形式的革新，接受国家主权的分割和分享，直至国内与国际问题之间界限的消失。总之，在从“帝国”向“民族国家”转型的过程中，旧有的问题还没有消化，新的挑战已经近在眼前。“民族国家”体制主导地位刚刚确立，就被发现了越来越多的“时代局限”。“帝国”似乎已经走远，但又似乎重新听到了人们的召唤。¹“帝国”的恶名和阴影依然萦绕在人们的心头，但让它重操旧业恐怕很难。一百年过去，世界完成了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转变，但对未来依然充满疑惑。

纵观从“帝国”时代到“民族国家”世界的转型，我们会发现许多“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之处。而这脱节之处，或许恰恰可以成为我们走出困境的起点。首先，就“民族国家”的“理论”与“实践”而言，我们会发现有关“民族国家”的学术著作汗牛充栋、见仁见智，但基本上都以欧洲的民族国家（或民族—国家）为“原型”或出发点。而在现实世界中，真正符合欧洲“民族国家”标准的为数不多，而这样国家又构成当今世界“民族国家”的多数。因此，我们有必要“跳出西方‘民族国家’的话语窠臼”，才能够在“民族国家”的理论与现实研究中“行稳致远”。²其次，“民族国家”构建的前提是“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对于再构建国家来说，民族主义是凝聚人心、重塑认同和焕发精神的最有号召力的旗帜。通过“民族国家”的构建，这些再构建国家重新焕发了活力，摆脱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再度“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是，对于许多构建中国家来说，民族主义的旗帜没有那么强烈的吸引力。在这些国家，人们对于宗教（或教派）、部落、族群的认同已经延续千年，而“民族国家”对他们来讲，只是最近几十年才出现的新生事物。因此，根深蒂固的部落政治依然在中东和非洲的许多国家发挥着重要作用，逼得许多国际关系学者把研究重点转向族群政治或部落政治，并把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等领域里的专家邀请进来。在这样的地方，传统意义上的国家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失去了“用场”。第三，“民族国家”与“帝国”并不是二元对立的，从“帝国”时代向“民族国家”世界的转型也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³实际上，即使在当今这个主要由“民族国家”构成的世界上，帝国依然没有远去。作为最早的民族国家，英、法等殖民帝国直到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寿终正寝。王赓武把这种在欧洲为“民族国家”、在欧洲以外是庞大殖民帝国的国家称为“民族帝国”。⁴冷战期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也经常被描述为帝国主义国家。冷战终结，美国尽享“单极时刻”，被形容为“现代罗马”。⁵卡赞斯坦认为美国的超强实力使其具备了帝国的特征，在研究美国与欧洲和亚洲的关系时，他便使用了“美国帝权”（American Imperium）的概念。⁶实际上，美国赤裸裸地干预他国内政，甚至军事入侵，策动政变，扶植傀儡政权，把自己的意志凌驾于国际社会意志之上的“帝国主义”行径，多少年来一直遭到他国甚至美国盟国的谴责。

“我们生活在拥有近 200 个国家的世纪里，每个国家都展示着其主权的种种象征（国旗、在

¹ 潘兴明、高晓川：《帝国治理：关于世界秩序的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

² 马德普：《跳出西方“民族国家”的话语窠臼》，《政治学研究》，2019年第2期。

³ 张扬：《旧邦新命：帝国转向之后的民族主义和国家研究》，《清华社会学评论》，2017年第2期。

⁴ 王赓武：《更新中国：国家与新全球史》，黄涛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

⁵ 彼得·本德：《美国：新的罗马》，夏静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

⁶ 彼得·卡赞斯坦：《地区构成的世界：美国帝权中的亚洲和欧洲》，秦亚青、魏玲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联合国的席位)，而且每个国家都声称代表各自的人民。无论大小，这些国家原则上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依据国际法联合在一起。但是，这个我们视为当然的民族国家的世界迄今仅60岁。”这是简·伯班克和弗雷德里克·库珀《全球帝国史》第一章的第一段话。这无疑是当今世界的真实写照。但在这段话不久，他们马上又提醒读者：“帝国的持久性挑战了民族国家是自然的、必需的和必然的观点”。这句话对我们理解当今世界显然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他们在书中还认为“帝国尚未让位于由一个民族国家构成的稳定的、正运转着的世界。”¹面对这样一个已经实现从“帝国”向“民族国家”的转变，但依然充满迷惑的世界，有中国学者认为，纵观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的演变，民族国家与帝国呈现出一条周期性替代的线索。当民族国家体系孱弱的时候，帝国就不期而至。当民族国家强有力运作的时候，帝国就隐然退却。帝国在民族国家的国际体系缝隙中获得周期性重建的契机。当今世界，恰好进入民族国家衰颓、帝国重建的活跃时期。旧帝国的复活与新帝国的建构，成为帝国重建的两种基本模式。在民族国家与帝国的周期性转换之间，人类寻求进步，以期获得解决这一不良循环的出路。²当然，涉及到中国，也有学者表达了比较谨慎的态度，认为，传统的“帝国”概念与“民族—国家”概念均不足以描述中国国家形态的复杂性，甚至可能遮蔽中国学者对人类政治形态多样性的理解及对人类发展的想象空间。中国学者的理论研究迫切需要从历史与现实出发，发展出具有主体性的研究视角，以此定位中国自身的发展方向。³

四、余论

纵观人类历史的发展变化，无论部落还是城邦，无论王国还是帝国，无论多民族帝国还是单一民族构成的“民族国家”，实际上都是人类“共同体”演进的不同形式。这种共同体既可以是单一的，也可以是复合的。世界之大，各地区人类共同体演进的形式和时间不可能整齐划一。当世界各地都按照“民族国家”的方式组织起来的时候，这种差异导致的问题、矛盾和冲突就出现了。而随着历史的发展进步，人类社会各种形式共同体的范围也越来越大，复合的机会也越来越多。因此，一方面，我们看到一些地区的部族政治似乎固化在那里，让新兴的“民族国家”举步维艰；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持续深入，资金、技术、知识、人才和商品正在更为自由地流动，全世界正在按照市场需求的供应链重新组合起来，形成了新的超越国界的“超级版图”。⁴换言之，支撑民族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 and 地理条件正在发生变化，这或许为化解民族国家的“历史拖累”、甚至为构建超越国家的更大的利益共同体铺平道路。

“共同体”是一个含义非常广泛的概念，可以涵盖从村庄到网上的虚拟世界。⁵共同体既包括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氏族和部落，以婚姻关系和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家庭，也包括以共同的经济生活、居住地域、语言和文化心理素质为纽带形成的民族或民族共同体，⁶区域共同体、跨国合作倡议和国际组织等超越国界的共同体越来越受到学界关注，入江昭把“国际组织”作为超越民族国家，建立“全球共同体”的尝试。⁷实际上，共同体已经不再是必须与共同拥有的地

¹ 简·伯班克和弗雷德里克·库珀：《世界帝国史：权力与差异政治》，柴彬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5-7、383页。

² 任剑涛：《民族国家时代的帝国依赖》，《中国法律评论》，2019年第4期。

³ 强世功：《超大型政治实体的内在逻辑：“帝国”与世界秩序》，《文化纵横》，2019年第2期。

⁴ 帕拉格·康纳：《超级版图：全球供应链、超级城市与新商业文明的崛起》，崔传刚、周大昕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

⁵ Karen Christensen and David Levinson, eds, *Encyclopedia of Community: From the Village to the Virtual World*, SAGE Publications, 2003.

⁶ 张志旻等：《共同体的界定、内涵及其生成——共同体研究综述》，《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0年第10期。

⁷ 入江昭：《全球共同体：国际组织在当代世界形成中的角色》，刘青、颜子龙、李静阁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域相联系的“在场共同体”，“脱域的共同体”和跨文化的“虚拟共同体”正在不断产生并对世界产生越来越多的影响。¹有学者甚至认为互联网推动了共同体的进化和人类秩序的演进，即从家元共同体提供认同和“自然秩序”，到族群共同体许诺共识和“创制秩序”，再到互联网以其技术逻辑、核心价值和多元语境重构功能确立承认原则和构建多样共生的生态秩序。²

历史地看，无论是把中国视为一种帝国，还是视为一种文明，无论是把中国视为一种早熟的现代国家，还是视为最近几十年迅速崛起的超级大国，中国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地在“我者”与“他者”寻求相互认同和融合的共同体的历史，这是中国历史的独特之处。³可以说，中国的历史经验能够为“帝国”与“民族国家”的困惑提供有益的思考。实际上，如果我们把“帝国”和“民族国家”放在人类共同体演进的序列中去考察，就不会在非此即彼之间犹豫徘徊，就不会拘泥于形式和名称，而为“人类共同体”的实现开辟出新的更多的发展空间。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中国的历史经历与欧洲和中东各大帝国的历史经历差别很大，但中国还是被多数西方学者认定为“帝国”，而且是唯一被淘汰出局之后又成功地重返大国行列，并且能够挑战美国世界主导地位的“帝国”。⁴这就为中国大国角色的发挥增加了难以想见的难度。就相关学术研究而言，如果说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是霸权护持，英国学派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是国际社会的形成与发展，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应该是作为一个上升的大国如何和平融入国际社会的问题，⁵那么这种和平融入就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国际社会的既有规范，还应该包括主动地参与塑造新的世界秩序，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主动地推进和塑造新的利益共同体，与更多的国家和地区构建更多的共同利益述求，让从“帝国”向“民族国家”转向的世界被更多的利益共同体充实起来。这是一个挑战，更是一个出路。

【论 文】

2009年。

¹ 肖珺：《跨文化虚拟共同体：连接、信任与认同》，《学术研究》，2016年第11期。

² 胡百精、李由君：《互联网与共同体的进化》，《新闻大学》，2016年第1期。

³ 参阅许倬云：《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

⁴ 赫尔弗里德·明克勒：《帝国统治世界的逻辑：从古罗马到美国》，闫振江、孟翰译，中文版前言，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

⁵ 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网络文章】

马强：后苏联时代如何塑造新人？

青年知识分子访谈系列之一

https://mp.weixin.qq.com/s/iUG0tU8taJC-R_DFY_T3zw (2020-10-27)

曾梦龙，燕京书评

历史学家许纪霖曾提出“20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的概念，他以1949年作为中界，分为前三代和后三代，即晚清一代、五四一代、后五四一代和“十七年”一代、“文革”一代、“后文革”一代。姑且不论这样的划分有几分道理，但至少我们能看到知识分子和时代相遇的不同故事。不过，这些故事具有的音量并不相同，由于权力、资本、能力等因素，我们相对来说较少听到青年知识分子的声音。他们年轻，大多是80后，受过比上一代更系统和国际化的学术训练，也更富有激情、雄心，站在学术前沿，在传承和创新之间探寻出路。他们是中国知识界未来的希望，他们的声音值得被更多人听到。

我们乐意发掘愿意和公众对话的青年知识分子，倾听他们的声音，扩展公共讨论空间。但是，我们无意鼓吹“后浪”似的青年崇拜，青年知识分子也不是铁板一块，在他们的故事中，同样可以看到差异、局限和困境。

这是系列的第一篇，受访人是人类学者马强。

受访者简介：马强，1982年生，黑龙江同江人，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所副研究员，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研究方向为社会人类学、俄罗斯社会与文化，著有《“俄罗斯心灵”的历程：俄罗斯黑土区社会生活的民族志》。他说：“我想用人类学的方法、视角来呈现俄罗斯人的社会生活。”

今年38岁的马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所副研究员。过去十多年，他的主要工作是在俄罗斯做田野调查，深描剧烈社会转型下俄罗斯普通人的生活。在他看来，俄罗斯可能是中国人最熟悉也最陌生的国家。比如许多中国人都知道苏联老大哥、战斗民族、托尔斯泰、喀秋莎等符号，但对俄罗斯人的社会生活这种基础性知识缺乏了解。

与此类似，过往中国的俄罗斯研究偏重文学和政治，不太关注俄罗斯人的社会生活。而且，谈起前几代赴俄的中国人，马强觉得“他们对俄罗斯社会好像都没有深入了解”，“都是上那儿取某种东西，为我所用”。所以，到了他这一代学人再“走出去”，希望通过海外民族志让中国人对俄罗斯有比较贴近现实的认识。“这也是我们的使命。我想用人类学的方法、视角来呈现俄罗斯人的社会生活”，马强说。

马强的田野调查，始于2007年。当时，经过八小时的飞行，对俄罗斯了解不多的他，被直接“扔”到莫斯科。那时，马强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参加“北京大学—莫斯科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生项目”来俄罗斯做研究，但田野地点和调查主题都没确定，“像扔到海里自己学游泳”。

初到俄罗斯，马强的最大冲击是俄罗斯跟中国的新闻报道不一样，并不苦难、危险，而是个有秩序、文明的社会：“在莫斯科印象最深的就是排队，到处都在排队，但是没人插队。我当时学的第一句俄语就是‘谁是最后一个’，因为排队要问。”

来俄罗斯前，马强最早和俄罗斯结缘是在家乡黑龙江同江。同江地处松花江、黑龙江交界，对面就是俄罗斯，“离我们县城七八里地”。当时，苏联刚解体，物资紧缺，兴起边贸热，小城随处可见“老毛子”的身影。很多中国人也去俄罗斯经商，叫“倒包”，发了家。

“我们家亲戚一堆人倒包，我关于俄罗斯的很多信息都是来自他们，他们从南方进来服装鞋帽，运到边境城市哈巴、共青城去卖，他们成为我们小城第一批富起来的人。那地方就是一个梦，俄罗斯梦，遍地黄金。”马强回忆到。

为了满足边贸需要，同江的中学只教俄语。在俄语课上，马强读了许多俄罗斯文学作品，对俄罗斯有一种和淘金梦完全不同的想象，比如莫斯科红场上五颜六色的圣瓦西里大教堂、托尔斯泰的庄园亚斯纳亚伯利亚纳，觉得那是个童话般国家。也因当时高考俄语比英语简单，所以马强觉得自己才多拿十多分，有幸从小城考到北大。

“但现在情况有点不一样，我所在的中学里最优秀的学生都在学英语，俄语已经慢慢没落。仔细一想，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是一个去俄化过程。”

大学期间，北大社会学系的高丙中教授正在做海外民族志项目，想派学生去俄罗斯做田野调查。因为语言和系所的便利，高丙中找到马强，对他说：“俄罗斯是中国最具对比性的国家，而中国人还并没有真正了解俄罗斯，这是海外民族志的使命，俄罗斯经验研究大有可为。”正在读大二的马强听得热血沸腾，立下宏愿——“到俄罗斯去做主体民族的田野调查，写一本关于俄罗斯的海外民族志”。这成为他十多年的奋斗目标。

2017年，根据博士论文修改而成的著作《“俄罗斯心灵”的历程：俄罗斯黑土区社会生活的民族志》出版，马强得偿所愿。他称，纵观俄罗斯一千多年的文明史：罗斯受洗、彼得一世改革、农奴制改革、十月革命、苏联解体，俄罗斯始终站在“十字路口”，“俄罗斯勇士”总是在面临着抉择。

“俄罗斯向何处去”，成为人们长期思索和讨论的话题。相比既有的研究，马强觉得，关注俄罗斯普通人的社会生活，理解其文化逻辑和价值观体系，走进“俄罗斯心灵”，能够厘清俄罗斯社会转型的方向和路径，从而为“俄罗斯向何处去”寻找答案，也对解决中国问题起到参照。

“后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并非按照图纸建房子那般简单，俄罗斯黑土区乡村的民族志材料告诉我们，社会转型异常复杂，是与各种社会制度的联动，历史遗产、文化传统也影响着转型进程。在社会转型中，每一件事情都像抛硬币一样，被抛上天空，但又掉落到相类似的结构和类型之中。”他在书中写道。

当时，马强接触大量农民，觉得祖祖辈辈都过得苦难。“我采访过很多六七十岁的老人，他们都是青壮年时在集体农庄劳动，老了全身是病。我们在电影里看到过苏联集体农庄的幸福生活，并将其作为奋斗目标，但实际上，集体农庄庄员们的生活非常苦，用他们的话说，像老黄牛一样操劳一生。集体农庄解散以后，很多人没有了工作，酗酒度日。他们的很多钱存在银行，因为金融危机卢布贬值，多年的积蓄一夜之间连废纸都不如。即使到现在，他们成了拿退休金的人，也就将够温饱，吃肉都很费劲，我房东家里的红菜汤常年用最便宜鸡肉煮。”

这些年，他反思当年研究的不足：一是缺乏理论对话，沉浸于繁杂的材料中无力自拔；二是俄罗斯太复杂，“俄罗斯心灵”在不同地域、阶层等可能会有不同理解和表征，比如“有一个社会学家说有四个俄罗斯：大城市、中等城市、市镇、乡村，完全不同”，当时所做的论述有些武断。

黑土区之后，马强重回俄罗斯做田野调查，地点在俄罗斯南部顿河畔罗斯托夫，主题从乡村社会转型变成城市社会组织。今年，他本打算去海参崴，但因疫情影响，只得作罢。同时，他还在做苏联解体口述史研究，希望找到50个人，聊聊苏联解体给俄罗斯普通人带来什么样的变化，他们又如何度过这段岁月。

“苏联解体是二十世纪全世界的大事，一个体制轰然倒塌，但在俄罗斯没有流血、也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回顾这个过程，可以让我们对俄罗斯社会有更为深入的认识。”

螺旋式传统：在剧烈转型中重建自我认同

全：你是从“俄罗斯心灵”的文化实践角度探讨俄罗斯社会转型，认为“俄罗斯心灵”的回归与重建实际上变成如何“塑造后苏维埃新人”的问题，也关注“后苏维埃新人”如何组成社会，如何在社会变迁的废墟上进行社会重建。其中，东正教和国家权力互动是最重要的因素，对吗？

马：俄罗斯宪法明确要求没有意识形态，但一个国家怎么可能没有一个核心思想来统领？现在，俄罗斯官方角度比较强调强国主义，以及强国主义所衍生的爱国主义。为什么普京在疫情中间还要阅兵？因为他要找到能够凝聚所有俄罗斯人的力量。

第二个是共同信仰找到东正教，这是很经济的方式。因为俄罗斯族在俄罗斯人口占到大多数，俄罗斯族里东正教徒又占了大多数，所以他们大力提倡东正教复兴。教会在法律上和世俗政权划清界限，不能干预世俗事务，但它起到了在民间凝聚力量的粘合剂作用。

沙皇时代也推广这个东西，俄罗斯历史上有著名的“三位一体”，这个国家怎么能稳定？东正教、专制制度和人民性。现在普京走的这条路跟这个挺像，国家力量和东正教整合俄罗斯，让俄罗斯达到社会团结状态，起到非常大作用。

俄罗斯的国家政权力量现在很强大，教会力量也在不断增强，它们相互配合。国家政权不再限制教会发展，而且教会提出很多东西是为了配合国家政策。比如我2015年去罗斯托夫，发现教堂到处贴着宣传口号——不要堕胎。当然，这也符合东正教教义。但是，俄罗斯政府非常需要人口。因为他们人口特别少，需要降低堕胎率。后来，我发现四处宣讲反对堕胎的社会运动不仅受到东正教会的支持，还得到了统一俄罗斯党地方党部支持。

全：你觉得革命破坏俄罗斯传统，但没有完全摧毁，传统作为遗产仍然在黑土区乡村社会生活中发挥影响力，后来国家也重建传统。那你觉得革命对俄罗斯传统秩序的破坏性到底有多大？

马：过去，我认为苏维埃政权的无神论运动是一场“文化革命”，将宗教信仰全面消灭干净，但是我去调查时，发现很多苏维埃时代出生的人都是教徒，一问才知道，他们都是在苏维埃时代洗礼的。

那时，虽然大部分教堂都被铲除，但还有一些是开放的。如果你是信徒，还是可以去礼拜的，只是共青团员、共产党员是不允许进入的，有人监督。在乡间还有游走的牧师，他们可以到家里为新生儿洗礼。因为这是村里人共同的需求。在大多数人看来，没有经过洗礼的孩子总爱生病，这是最朴素的宗教情感，所以这些游走于乡间的牧师并不会被举报。

当时，家家都有圣像角，圣像角就是家里的墙面和顶棚的夹角，一般而言是家里最明亮的角落，在这里摆放圣像，是家里的神圣空间。圣像角旁边摆放着家庭人员照片，有点神明护佑全家的意义。在苏维埃时代，圣像角始终没有被清除，人们可以在家里做礼拜。好多人跟我说，他们遇到难事或者最悲伤的时候，还是要向神祈祷。

如果仔细观察苏维埃政权的文化实践，有很多都是对传统的借用。即使苏维埃政权刚确立时，他们急于把过去那些所谓糟粕去掉，但他们运用的动员方式还是宗教那一套，比如曾把圣诞节改成“共青团圣诞节”，用圣歌曲调歌颂共青团的诞生；把教堂改成宣扬无神论的博物馆；不是在神像面前缔结婚约，而是在组织面前；新生儿的洗礼被废止，但也有命名仪式，不再取圣徒的名字，“列宁”的名字颇受青睐。苏维埃时代的偶像崇拜也继承于传统，抬着革命领袖的画像在大街上游行，跟东正教抬着基督耶稣像的宗教游行很像。苏维埃政权在红场上建了列宁墓，将他的尸体永久保存，也能让我们联想到东正教的圣尸传统。

新政权想动员普通人，必须以民众熟悉的方式、文化，其中包括很多东正教的传统。这样看来，革命前那一套秩序、传统是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的。再加入苏联时代的文化要素，通过再生产和再包装，变成一种新的东西。后苏联时代的文化实践机制还是一样，其中裹挟了很多苏联时代的要素，又被重新包装和再生产。

当然，他们也遭遇现代化和全球化，很多农民进了城，传统逐渐消失，在城里他们形成新的传统。他们也过节日，可能有新的仪式。比如，我房东的那个村子，在苏联集体农庄时代有合唱队，但合唱队在革命前就有，脱胎于教堂唱诗。合唱队唱什么呢？赞美集体农庄、给工人演出、唱民歌等。但是，现在很多人都走了，到城里了，解散了。她说她母亲和婆婆那一代都会做手工纺织，逐渐年轻一代没有了。但是，她们会买机器纺织的帘子搭在圣像上，还会听合唱，可能听的是城里文化宫演员来演的，而面对这些，她自己不再是一个参与者。

传统是螺旋式存在，文化的韧性始终在；或者说，他们脱离这种秩序和生活方式，就不会生活了。所以，这套东西对他们重建自我认同特别有意义，而不是像糟粕那样完全扔掉。对我们而言，可能社会转型没有那么剧烈，没有经历道德、价值观真空的阶段。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有着深刻的体验，贾瑞特·齐贡（Jarrett Zigon）关注当代俄罗斯的道德建构问题，这个非常重要。

俄罗斯是非常讲究精神文化的民族，很多人因为制度没了，他毕生信仰的东西突然被说是假的、错的，那么多东西诬蔑他过去的信仰，受不了就自杀。太剧烈的社会转型对人的冲击特别大，在重建秩序过程中，传统那一套东西，尤其是宗教，对他们心灵是特别大的抚慰。

后来我在罗斯托夫做调查，去教堂访问一个人。她在苏联解体之前，家庭非常幸福。之后，她跟她老公开饭店，老公被枪杀了。当时的社会特别乱，她还带个孩子，她家甚至面临挨饿的危险。因为要办葬礼，她去了教堂，她觉得那里特别安宁，她就总去教堂，进了唱诗班。后来，教堂里的朋友给她介绍了新工作，让她的生活逐步走向正轨，正是教堂帮她度过了最难的时刻。精神上的生活是让他们回归正常生活很重要的元素。

在急剧的社会变迁下，人们渴望稳定的秩序，精神文化是构建新的秩序的基本要素，这就指向了传统和信仰，民众乐于接受这套东西。

全：你说：“在当代中国，国家对待传统文化、民间信仰等态度仍然较为暧昧，虽然已经逐渐认识其积极意义，但是仍然把传统文化视为积极改造的对象。近代以来‘以俄为师’‘以俄为鉴’对于今天的中国在文化自觉的意义上依然具有现实意义。”能不能具体谈谈有什么现实意义？

马：在俄罗斯，无论是政权还是民众，都会积极利用和享用传统文化，并不会将文化分类成为精华和糟粕。据我观察，传统文化在黑土区秩序重建中起到了特别大的作用，这是一个很经济且又让当地人都很舒服的方式。

中国人实际很需要精神慰藉，在日常生活中需要建立相互信任关系，也需要建立别人对你的信任关系。“一带一路”是一个好东西，周边的欧亚国家都承认这一点，但为什么投出去好多钱，派出去好多人，收获的却是那么多的负面评价，“中国威胁论”反而上升？在俄罗斯，很多人对我说，我很惊讶你们中国人没有信仰，我们和没有信仰的人打交道就感到很可怕。可能这是俄罗斯人对我们的偏见：中国人怎么可能没有信仰？但这就是事实，这个偏见我们无法消除。

说一个我在莫斯科的例子吧，当时在莫斯科打车还没有现在这么方便，打车到机场我是不敢找中国司机的，经常找俄罗斯人。和俄罗斯司机谈好价格，那就是多少钱，遇到的中国司机经常在车上涨价。

低端发育：俄罗斯的公民社会

全：你后来研究俄罗斯城市社会组织，能不能分享一些发现和想法？

马：俄罗斯公民社会跟西方公民社会是两个概念，我们不能把西方公民社会理论套到俄罗斯社会的现实中。如果按西方社会理论，俄罗斯没有公民社会。我去顿河畔罗斯托夫的一所大学访学，学校给我安排的导师与我第一次见面时就告诉我，在俄罗斯没有真正的社会自组织，也没有所谓的公民社会。因为在西方的公民社会理论下的第三部门是独立于经济和政治部门之外，而且它跟政治部门之间是监督、对抗的关系。

当时我感觉到很失望，但换个角度想想，俄罗斯没有公民社会，那俄罗斯社会如何组织在一起的？这个研究主题可能会让我更加兴奋。

俄罗斯是强国家、弱社会，国家吸纳社会。你要按照那个标准，俄罗斯社会组织不独立。俄罗斯的官方文件和新闻稿中经常出现公民社会的概念，而普京最有代表性，他认为公民社会是公民积极性，公民怎么积极进行社会建设，解决很多政府解决不了的问题。很多社会组织是国家购买社会服务的对象，他们每年都要搞总统基金，社会组织以争取到总统基金为目标。因为他们除了这个，很少有基金。外国对社会组织的资金，已经通过各种法律完全堵死。你要用外国资金做了政治活动，就给你贴上“外国代理人”的标签，后果很严重。所以，俄罗斯的社会组织跟国家联系非常紧密。

再一个就是志愿者运动，俄罗斯通过搞奥运会、世界杯，志愿者运动很兴旺。我在俄罗斯时，参加志愿者活动的年轻人特别多。他们考学、找工作，参加过志愿活动都是加分项。做志愿者也是个时尚，有国家鼓励，所以青年人志愿活动特别多。

当然，在政治领域方面，俄罗斯现政权绝对不会让社会组织涉足。所以，像西方意义上的公民社会那样形成社会舆论，监督政治机构，这在俄罗斯是没有的。当然，如果你以那个标准来看，那俄罗斯公民社会水平很低。但是，在他们角度来看，公民社会挺活跃。

对于那些非营利组织里的人来说，他们很不满。一个组织没有独立发展空间，很受限制，没有资金来源，注册也非常麻烦，开展活动很难。但对于普通大众来说，他们不太相信社会组织。尤其在苏联解体前后，大量西方非营利组织、非政府组织进入俄罗斯。到俄罗斯之后，他们搞了很多项目，孵化很多社会组织，但没有取得很好效果，也没有让民众获得多少好处，反而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秩序。而且，俄罗斯人对于“组织”天生不信任。有个调查显示，他们遇到困难时，最想找的是亲朋好友，通过私人网络获得救助，很少会找社会组织帮助解决问题。

全：近些年，俄罗斯的反对党和社会运动逐渐多了起来，你也写过“为了诚实的选举”运动的论文，所以想问问你对俄罗斯的社运和政党有什么观察和想法吗？

马：俄罗斯政坛是有反对派的，分体制内和体制外。体制内反对派如俄罗斯共产党、自由民主党等，但他们跟政权党很微妙。相对而言，体制外反对派比较活跃，如纳瓦里内等，他们关注政府官员的贪腐、观察选举等，一般是以集会游行的方式。

2012年出现大规模反动派运动以后，俄罗斯出台了《集会游行示威法》《网站黑名单法》《外国代理人法》，规范反对派的行动，他们可以集会游行，但必须事前审批，确定集会游行的时间地点和人数，否则为非法集会。这样，在法律的层面上就限制了反对派的活动。反对派可以组织游行示威活动，但必须在国家政权的控制之下，有限的范围内可以表达主张、发泄怨气，但影响力十分有限。

全：你说：“我们可以将‘俄罗斯心灵’作为一种文化身份，将其作为文化自觉的重要资源，但我们还要警惕另外一种倾向，那就是极端民族主义。”那你如何看待现在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情况？

马：俄罗斯是个多民族国家，官方称有190多个民族，民族主义或者更确切的说是极端民族主义对其造成的伤害是颠覆性的。俄罗斯民族政策的核心是铸牢多民族共同体，这一点与我国有些相似。俄罗斯不断强调各民族生活在同一个国家，曾有过构建公民民族的努力。当代俄罗斯民

族政策极力摆脱苏联时期民族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如将俄罗斯族视为其他民族的“老大哥”、大俄罗斯主义等。

当然，当代俄罗斯也有民族主义情绪，比如有一些口号是“俄罗斯是俄罗斯族的俄罗斯”。民族分离主义现在被压制，在条件合适的情况下也有爆发的风险。苏联解体以后，经历了民族分离主义的波澜，俄罗斯的民族政策已经转向民族文化自治，更强调各民族的文化身份。

另一方面，俄罗斯政府密切监控极端民族主义的传播。过去民族区域自治还保留着，像车臣、鞑靼斯坦这些共和国的力量很强大，拥有很大的自治权。同时，俄罗斯也不断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联邦制结合起来，弱化民族自治地方身份，强化联邦主体的身份。

俄罗斯的民族问题起源于帝国的扩张，一些语言、宗教相异的民族被纳入帝国的版图，如何治理、如何将其与俄罗斯族或者说斯拉夫民族融合为一个共同体，这一直是俄罗斯面临的一个难题。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积累了很多治理经验，当代俄罗斯也借用帝国时代统治少数民族的策略，比如利用家族、部族政治力量来控制这些民族共和国，在车臣共和国就是这样做的。

俄罗斯的民族分离主义现在是被压制住了，但在平静的表面下依然暗潮涌动。在顿河畔罗斯托夫访学时，我有着切身的感受。那里被称为“北高加索之门”，北高加索各民族都生活在那里。这些被征服的民族有着太过沉痛的被征服、种族清洗的历史记忆，是俄罗斯“内部的他者”，一旦联邦中央的控制力减弱，或者民族政策出现问题激化民族矛盾，北高加索很可能是一个火药桶。

时代变了：俄罗斯需要新鲜血液

全：你提到在俄罗斯私有化进程中，依靠“偷窃”手段独占集体资源的先富者们被称为“新俄罗斯人”，他们的财产来源缺乏正当性，为民众所诟病。那现在“新俄罗斯人”的状况如何？

马：经过普京的一系列政治改革，叶利钦时代那种寡头控制政治的局面不复存在，但寡头并没有被消除。最为关键的是，这些寡头，所谓的“新俄罗斯人”，是苏联解体以后经济和社会体制转变的受益者，获得了丰厚的经济资本，甚至是政治资本，但他们却没有赢得声望。主要原因在于，他们的发迹是通过私有化过程中的制度漏洞，用老百姓的话说是“偷”来的。

因此，俄罗斯民众对这些寡头、政府官员评价很低，这种负面评价一直持续到现在。这背后是当代俄罗斯存在社会公平不足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官员的贪腐、选举舞弊、退休金改革等问题能引起那么大的公愤。

全：你提到，在整个俄罗斯，民主体制实行二十多年了，但民主理念并没有深入人心。有位村民对你说：“俄罗斯人是一群羔羊，需要一位好牧人，俄罗斯民族是需要赶的。”还有村民说：“我们要的不是民主，最需要的是秩序。”你怎么看待这些俄罗斯人对民主的看法？

马：这本书写的很多都是村民，我接触到的很多村民对民主都有反面认识，他们是社会转型的失意者，认为他们的窘境是新制度带来的。他们不理解真正的民主制度是什么样子，反而觉得民主造成混乱，都是骗人的，没给他们带来好处。印象最深的是以前一个集体农庄主席很巧妙地用一个很相近的词来类比：民主（демократия）就是蛊惑宣传（демагогия）。

当然，俄罗斯上层和中产阶级，或者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还是希望有制度改革、更多自由等。每个阶层看法不一样。对于那些村民和社会底层的人而言，他们的记忆太过深刻，那个实行所谓民主改革的时代，是一个风雨飘摇、衣食不保的时代，那我要它干嘛？他们要的是秩序、稳定，“政权是不是极权体制跟我没关系，我需要的是稳定安逸的生活”。

还有一点，他们对领袖的态度移情于对沙皇的态度，甚至沿袭对上帝的认识，比如你经常会听到俗语说，“你向上吐痰，会落到自己脸上”，就是你不能向上抗争，因为说上面坏话会自取其辱。他们普遍形成了这样一种认识：我要的不是民主，要的是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历史证明，只有强有力的领导人，国家才会越强大，这种论述逻辑在俄罗斯民众中间很有市场。当然，这跟

民主本身没有关系，是对民主的一种认知而已。这套话语动员老百姓很有效，尤其在底层民众中间根深蒂固。

全：你在书里对俄罗斯现实有一个概括：“民主制度被表述成为有俄罗斯特色的主权民主；民众对‘卡里斯玛’型领导人的崇拜和支持；新自由主义思潮衰落，新保守主义思潮甚嚣尘上。社会转型阈限状态的某些特征被固化，而这与俄罗斯旧有的政治、社会和文化传统联系紧密，且具有延续性。”现在又过了几年，怎么看当初这个论断？

马：应该是愈演愈烈。尤其是乌克兰事件、合并克里米亚之后，面对西方世界的制裁与压力，保守主义越来越兴盛。这次普京修宪，很明显，他要把权力延续下去。年初，俄罗斯问题专家们还在讨论2024年后普京的接班人问题；如今，开始讨论普京的“2036”问题。

全：刚提到普京，今年是他执政20年，你会如何评价普京执政20年来对俄罗斯社会文化转型的功过得失？

马：过去20年，老百姓对他比较肯定，在于他恢复正常社会秩序。民众普遍认为，叶利钦时代太糟糕，是一个失序的年代；普京回来，正常秩序才回来。普京最得民心，最高光时刻是合并克里米亚。这是苏联解体以后第一次让俄罗斯领土变大，俄罗斯人最荣光的一件事。当时，他的支持率堪称爆棚。克里米亚事件以后，他不再是政治人物，是个历史人物，功过是非已经断定。

他对俄罗斯的影响怎么样？可能在这个历史阶段，他是最合适的人，起码民众对他的欢迎可见一斑。但是，也有很多不喜欢和反对普京的人，他们也可以给出很多理由。不过，让他们选一个人当领导人，他们选不出来，目前就是这种状况。

全：如果普京执掌俄罗斯到2036年，你觉得可能会对俄罗斯产生什么影响？

马：我不搞国际政治研究，对这个问题很难回答，而且我觉得社会科学无法对未来进行预测，更何况面对的是不确定性很强的俄罗斯政治问题？在我接触的俄罗斯人中，他们对普京的未来普遍持这样一种观点：普京的到来是2000年代俄罗斯的一股清流，将俄罗斯重新带到了正轨。2030年代，最为活跃的一代人是1990年代甚至是200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他们对于苏联解体以后经历的苦难、失序并没有记忆，政治稳定、强人政治可能不再是他们的第一需求。如果普京不再做出改变，可能也不会获得支持。毕竟时代变了，需要新鲜血液。

全：现在俄罗斯的改革呼声也越来越强……

马：很高，但主要因为经济问题。2014年的国际制裁以后，很多人生存在贫困线以下，现在的生活状态比我在的时候还要穷。我2015-2016年去过顿河畔罗斯托夫，它是罗斯托夫州的州府所在地，号称“南部的首都”，但这个城市的平均工资水平也就两三千元，民众普遍感到收入捉襟见肘。而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日子更是艰难。

全：但他们的改革希望还是寄托在普京身上……

马：对，因为在俄罗斯最有动员力的人还是普京，但普京改革的可能性很小，这是个死结。

全：相比其他国家，俄罗斯在面对新冠疫情时有什么特点？做得怎么样？

马：面对这次疫情，俄罗斯做得不好，现在日增确诊病例人数已经降到6000人以下；四五月份，每天都是10000多人。疫情暴露了俄罗斯的社会治理存在问题，俄罗斯没有完善的基层组织、也没有发达的公民社会组织，无法将抗疫措施在基层社会切实贯彻实现，仅仅靠国家权力的管控是不够的。面对政治反对派或许可以，但是面对无孔不入的病毒，如果不能动员所有人起来抗疫，疫情很难控制。

疫情就像一次治理能力的考验，俄罗斯显然并不出色。疫情还造成了社会的分裂，外省人对莫斯科人避之不及，认真居家隔离的人对“遛狗党”、“散步党”口诛笔伐，有联邦主体对联邦政府的命令置之不理。

有一个概念叫“社会基础设施”。在疫情中，俄罗斯也展现出了雄厚的社会基础设施。俄罗斯的城市家庭，大多在乡村都有一间“别墅”，俄语叫“达恰”。这是社会主义时代的遗留物，现在成了人们休闲居住、种植果蔬的地方。而在疫情中，很多莫斯科市民都去了达恰自我隔离，有效地缓解了疫情的进一步恶化。另外，俄罗斯有很多慈善组织、社会组织、教会组织、民族自治组织，它们在疫情中对民众生活起到了很大的支持作用。尤其是哥萨克协会，哥萨克参与街头巡逻、发放抗疫物资、救助弱势群体。社会基础设施的雄厚，意味着这个社会更具有韧性。

苏联解体口述史：以普通人视角回看大事件

全：能不能讲几个印象比较深刻的田野调查故事？

马：2016年，我在顿河畔罗斯托夫做调查，那里挨着克里米亚和乌克兰。2014年，因为乌克兰东部发生冲突，好多乌克兰人跑到俄罗斯。在做调查的学校里，有一位老师就是从乌克兰跑回来的，身世很特别。他叫谢尔盖，我叫他老谢，俄罗斯族，出生在波兰，父亲是个军官。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叫《帝国》，波兰人卡普钦斯基写的，感觉和他很像，一直游走在帝国的边缘。

因为我要做一个苏联解体口述史的研究，就跟他说了，他特别支持我。在他住的小阁楼里，每周拿出4个小时跟我聊天。因为特别长的故事，我给你讲个大概：他出生在波兰，后随着当军官的父亲去了乌克兰，在那里上学、结婚、生子。在苏联时代，他曾经是个入党积极分子，但在递交入党申请书并准备批准时，党组织没了。他感到特别困惑，有一段时间曾经特别抑郁，因为没有了精神寄托。他认为共产主义的理想特别好，怎么就没了？而且，很多将之污名化的东西也冒出来，各种文章骂这个制度。他感到非常的困惑和痛苦。

后来，他去希腊留学。在希腊，有个东正教圣地阿索斯山。他去那里修行，通过修行接受了东正教。他认为，人总要有信仰，信仰能让他心灵得到慰藉。再后来，他在一所大学当老师，妻子也是老师。苏联刚解体后，学校发不出工资，家里特别穷，要养三个孩子。他选择辞职，在市场上做买卖，比如送水。他说，最艰难的就是那段时间。待生活好转一点后，孩子都长大了，他又赶上了战争。

战争爆发时，他在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州一个小城的小学当老师。他所在的学校，就在战区之内。在这种情况下，他坚持了半年，炮弹曾直接在他家附近爆炸。后来实在过不下去了，因为那所学校也发不出工资，他又没什么积蓄，最终决定去俄罗斯。他本身是俄罗斯族，去俄罗斯非常方便，通过熟人介绍去了一所教会学校当老师，这所学校就是我的调查地。因为他是个特别虔诚的东正教徒，觉得通过宗教教育能给普通孩子特别强大的精神力量。但是，他本身也是乌克兰公民，到了俄罗斯后，身份转变很难。在别人眼里，他是乌克兰来的难民，所以他迫切地想得到俄罗斯的公民身份。

后来，普京政府出台过一些政策，简化了这些从乌克兰来的人加入俄罗斯籍的程序。我离开顿河畔罗斯托夫时，他还在等待。后来，我们邮件联系，得知教会学校被教会撤销了，老谢又没有了工作。他回到基辅，和妻子、女儿生活在一起。他已经60多岁，还在为生活奔波。他的生命史贯穿着从苏联解体到俄乌矛盾，一辈子生活在颠沛流离之中，始终没有找到认同，是一个有点悲剧色彩的人物。

全：当初为什么想做苏联口述史？

马：我在俄罗斯做调查时，采访过很多老人。他们在谈自己的生命史时，习惯地将苏联解体作为他们生活的分水岭，都在说苏维埃时代怎么样，现在怎么样，苏联解体不只是政治层面的事，对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很多人失去了工作、家人、信仰。描写苏联解体的文献非常之多，但很少有作品能够俯下身来关注这个重大变故下的普通人的遭遇。

当然，很多人会想起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二手时间》，她展示的是在那个时间节点下普通人的苦难。但人类学的视野更关注社会变迁之下如何重塑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

然的关系以及人与神的关系等。我相信，在经历了暴风骤雨之后，人们还能建立起这些关系，毕竟人总要好好活下去。

再去俄罗斯时，我就有意识地找一些经历过苏联解体的人来聊，这件事究竟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又是怎么度过这段岁月？在我的访谈对象里，有政府官员、商人，也有教师、公务员、退休老人等。现在做了大概不到30人的访谈，已经整理出10万字，还有六七个访谈没整理。我想继续寻找这样的被访对象，计划找到50个。我今年本来计划去海参崴调查，但因为疫情，这个计划搁浅了。

全：就你现在获取的材料会怎么回答这些问题？

马：访谈的人数越多，越没有一个共识性的结论。每个人对这个历史事件的体验，都具有个人性的。总结起来，苏维埃时代和现在的生活都有它的好与坏。

在苏维埃时代，自由很少，限制特别多，时时刻刻受到监视和规制。但是，那时的生活比较稳定，每个人的收入都差不多。他们最喜欢讲的就是全国统一16戈比的面包；每个月100多卢布的工资，可以吃到肉和香肠，攒几年钱就能买辆车，多少年之后就会分得一套房，一切都是确定的。

但是，这套制度没有时，人自由了，没人再限制、监视你，做什么都可以。以前你把家产变卖是犯法的行为，现在可以随便买卖。然而，如今的一切都是不确定的，商店里的东西可能今天一个价明天一个价，可能今天有工作，明天就失业。

当然，很多人说他的能力更强，会有更高收入，说那些现在生活不好的人是因为懒惰。现在生活很差的人，就说这些人脑袋太机灵，偷了国家东西，用了不正当竞争手段等，他们还想过稳定生活。

这涉及到的是集体记忆。对于当下而言，这记忆可能也不是现实，是对现实生活的投射，甚至对于现在的不满。苏联解体是二十世纪全世界的大事，一个体制轰然倒塌，但在俄罗斯没有流血、也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回顾这个过程，可以让我们对俄罗斯社会有更为深入的认识。

全：再讲一些故事吧，比如反差比较大的两个？

马：我想到，在我调查的村子里有两个人，他们反差非常大。

房东的邻居叫安德烈，是一个快60岁的老人，俄罗斯族人，上世纪90年代初从哈萨克斯坦回到了俄罗斯，被安置在集体农庄。当年，安德烈的父亲被派往哈萨克斯坦，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安德烈在那里上学、结婚、生子，并有了很体面的工作。安德烈说，俄罗斯人在哈的待遇都很好，他们家有大别墅、汽车，郊外还有达恰。后来，苏联解体，他们那里的哈族人排挤俄罗斯人，便回俄罗斯了。回来以后，除了集体农庄分了个房子，他们什么都没有了。安德烈被安排到集体农庄工作，安德烈说他在集体农庄里学会了抽烟、喝酒、游手好闲，之前他在哈萨克斯坦可是不抽烟不喝酒的好男人。后来，集体农庄解散了，没有了固定的工作。土地被农场主或者农业公司承包，但他们明确表示不再用原集体农庄里的人，因为他们懒散、怠工、不好管理，安德烈失业了。有一次，我们见面的时候，他非常高兴地告诉我，他下个月就要满60周岁了，就可以领退休金了。有了退休金，生活就更宽裕了，可以买更多的酒喝。

我在村里还采访过一个农场主，独立经营土地的人。他在集体农庄的时候曾是个农技师，有着过硬的农业种植技术，还置办了很多农机设备，承包了几百公顷的土地，现在过得特别好。这和塞勒尼对后社会主义社会的观察相似，拥有文化资本的知识技术人员在社会转型中获得了更多的经济资本、政治资本。这位农场主很看不起安德烈这些人，他认为这些人没有“坚强的心灵”，特别懒惰、酗酒，过得差是自然的事，怨不得别人，是典型的“俄罗斯傻瓜”。

接触他们，我感触很深。当年，苏维埃政权在乡村推动集体化、无神论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培养社会主义新人。苏维埃政权认为，那些保守的、信教的俄国农民懒惰、不识字、酗酒、

不守时，而集体农庄需要勤劳、有知识、守时、遵守纪律的农业工人。70多年过去了，事情似乎出现了反转，集体农庄的农业工人像当年俄国农民那样被贴上了负面的标签。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实际上挺值得我们深思的。这可能不是人的问题，而是制度的问题。

俄罗斯研究：这一代学人的使命与前几代人都不同

全：如果请你用几个关键词构成一段话概括你的研究和关怀，你会怎么概括？

马：我想用人类学的方法、视角来呈现俄罗斯人的社会生活。跟其他学科相比，人类学最宝贵的是它的研究方法，能真正沉入对象的社区，去关注最普通人的生活，或者最弱势一群人，甚至是被污名化的一群人的生活。

全：现在和未来会做什么研究？

马：目前一直还在做俄罗斯社会研究，但会在研究主题上不断扩展，上面我已经提到的俄罗斯城乡差异，我以前的田野地点在乡村，后来扩展到城市，关注城市里的社会组织，关注他们的教会组织、非营利组织，也关注草根组织、青年组织、爱国主义组织。俄罗斯社会是如何通过这些社会组织组织起来的？目前我还在不断积累材料，这个过程很漫长。

我的研究主题还会向另一个方向扩展，那就是把俄罗斯作为一种文明来看待。俄罗斯有一个概念叫“俄罗斯世界”，这可能指的是俄罗斯文明传承和传播的范围。除了俄罗斯本土以外，境外的俄罗斯人、说俄语的社区和人群都是“俄罗斯世界”的范畴。俄罗斯也在积极地使用这个概念来联系境外的俄侨，增强俄罗斯在域外的影响力和软实力。

从边缘来看中心，是一种很有效的研究方式。我选择了中俄边界这个两种文明的交汇处作为下一步的研究地点，研究主题是中俄边民的社会交往。只有在这里，通过观察两国边民的交往互惠，才能切实地感到两种文明如何交融。

全：作为1980后的青年学者，你觉得你们这一代学人有什么特点吗？

马：对俄罗斯的研究，近代以来可能分为几个阶段：最初是去学革命理论的那批知识分子，像瞿秋白。到了1950年代，中国最精英的一批人规模被派往苏联学习。因为当时中国政策一边倒，学国民经济、国家治理和制度建设。再后来一批去苏联的人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那批商人。

他们那几代人对俄罗斯社会好像都没有深入的了解，都是上那儿取某种东西，为我所用。所以，我们这一代学人再走出去，尤其是海外民族志方面的研究，真正要了解海外社会的逻辑、信仰和价值观，需要通过细节、案例、研究来描述，让中国人能对另外一个世界有比较贴近现实的认识，发现世界上还有一群人在这样生活，他们的某些制度、做法可能对于中国有帮助。这也是我们的使命。

全：你对俄罗斯最感兴趣的问题是什么？

马：在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面临着颠覆性的转型。在我的观察中，俄罗斯社会没有发生断裂，也没有激进的流血冲突。后来，他们也经历很多经济、政治危机，包括恐怖袭击。最终，俄罗斯社会仍能维系一个很好的秩序，我对此比较惊讶。

全：你有一些想法吗？

马：社会的韧性。借用“文化之网”的比喻，个人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构成一条条经线（强国意识、爱国主义），个人和个人之间的关系构成一条条纬线（共同信仰、公民身份、伟大民族自豪感、苦难和胜利的历史记忆），经纬线细密地编织在一起时，这个社会就会很有韧性。

【网络文章】

俄建立全俄民族联合会推进国家民族政策战略

https://mp.weixin.qq.com/s/A9-VV8a6JLc_k43yEgyESg (2020-12-21)

马强，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研究中心副秘书长。

11月13日，俄总统普京签署关于建立全俄社会-国家组织“俄罗斯各民族联合会”的总统令。建立“俄罗斯各民族联合会”（以下称联合会）的倡议是2019年11月在纳利奇克举行的民族关系委员会会议上提出的，该会议由总统普京召集。在会后的任务清单上，其中一项是米舒斯金政府应在2020年4月1日前提提交为实施国家民族政策建立“社会-国家组织”的总统令草案。

一、建立“俄罗斯各民族联合会”总统令的主要内容

联合会成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改善国家的民族政策，促进全俄公民认同和民族和谐。

1、在社会联合会的参与下创建全俄社会-国家组织“俄罗斯各民族联合会”（Ассамблея народов России）。

2、联合会的创立机构是俄联邦民族事务署。

3、特别规定：

（1）联合会的最高管理机构是俄罗斯各民族联合会的理事会；

（2）联合会的常设管理机构是俄罗斯各民族联合会主席团；

（3）联合会的主要活动包括：

——参与执行《2025年前俄罗斯联邦国家民族政策战略》；

——保护俄罗斯联邦各民族的民族文化和语言的多样性；

——促进保护俄罗斯联邦人口较少土著民族的权利；

——吸引公民社会组织参与解决民族（族群）间和谐关系问题，防止极端主义和预防民族和宗教领域的冲突；

——制定和执行民族（族群）间关系领域的项目和方案；

——在实施国家民族政策领域向非营利组织、俄罗斯联邦公民，同时也包括外国公民提供信息、咨询和方法上的帮助；

——参与向外国同胞提供支持的工作，促进同胞与俄罗斯联邦的关系。

（4）俄联邦民族事务署要完成以下任务：

——确保俄联邦主体在俄罗斯各民族联合会理事会的代表性；

——通过理事会参与联合会的活动，为其实现目标提供支持，并监督任务的执行情况。

4、确保联合会理事会和主席团的构成人员中有来自俄联邦文化部、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和教育的代表。

5、俄罗斯政府应确保完成以下工作：

（1）联合会在莫斯科的办公地；

（2）批准俄联邦民族事务署在下一个财政年度和进一步的计划年度的联邦预算。

二、俄罗斯加强民族政策实施领域的国家力量

在俄罗斯，还有一个与联合会同名的组织，即Ассамблея народов России。虽同名，但组织的类型是不同的，该组织为全俄社会组织，成立于1998年。作为社会组织的全俄各民族联合会旨在保护个人和民族群体的民族权利，口号是“民族友谊-俄罗斯统一”。作为社会组织的俄罗斯各民族联合会成立的背景是在国家民族政策战略（1996）出台之后，俄罗斯各界意识到民族政策战略的实施需要有组织的社会力量加入才能完成。该联合会荣誉主席拉马赞·阿普杜拉季波夫谈到，建立俄罗斯各民族联合会是实现国家民族战略的重要一步，调整民族关系仅依靠国家单一力量是无法完成的。而政权声称能包办一切的时候，屡屡引发悲剧。除了联邦和地方的政权之外，公民社会机构也应该参与国家民族政策的实施。

根据普京的总统令建立的联合会属于社会-国家组织，与原有的组织相比，增强了组织中的国家力量。从该组织要完成的任务来看，它是具有吸引、协调、监督非营利组织等公民社会组织和各级政府机构的职能，在领导机构的构成上，也增强了政府机构的参与度，体现了民族政策领域的国家在场。这表明，国家权力加强了对民族问题、民族关系的控制。今年10月，普京曾表示，俄罗斯的力量不仅存在于全面的控制和军队的威力，还包括国家和社会的和谐。早些时候，普京曾表示，俄罗斯的力量来自多民族国家的特性。比如达吉斯坦共和国，在新冠疫情严重的情况下，该共和国获得了紧急援助。

俄国家杜马民族事务委员会主席瓦列里·扎加洛夫指出，建立全俄社会-国家组织“俄罗斯各民族联合会”将极大地推动全国各地的的工作，在地区以及联邦层面民族政策最成功的实践和创新都会被复制。他指出，2021年的联邦预算草案已经为该组织工作拨款6000万卢布，这些资金将围绕对民族政策有重大意义的项目和计划。俄联邦民族事务署、文化部、教育部、科学和高等教育部的代表纳入到联合会的理事机构中，会使得该联合会成为国家和公民社会机构之间互动的重要平台。相信联合会的工作在执行总统制定的国家民族政策方面创造广阔的前景。

三、《2025年前俄罗斯联邦国家民族政策战略》简介

新成立的联合会最为重要的任务是推进《2025年前俄罗斯联邦国家民族政策战略》的实施，该战略是2025年以前俄罗斯民族工作的指导方针，现简介如下。

《2025年前俄罗斯联邦国家民族政策战略》于2012年12月19日由普京签发的第1666号总统令发布，该战略确定了实施国家民族政策的优先事项、目标、原则、基本方向、任务和机制。

战略目标：加强俄罗斯的国家统一和完整，保护俄罗斯各民族的民族文化特性，与整个国家利益相结合的俄罗斯各民族利益，确保公民的宪法权利和自由。该战略的制定参考了其他领域的国家战略文献，包括以下领域：确保国家（民族）安全、长期的社会-经济发展、地区、对外政策、移民和青年政策、教育和文化等。该战略是在实施国家民族政策领域协调联邦国家政权、联邦主体和地方自治政权，与公民社会领域建立联系的基础。

该战略旨在加强俄罗斯各民族全面合作，民族语言和文化的发展。

国家民族政策的优先领域包括：

- 改善国家民族政策领域的国家治理；
- 加强族际和平和解，民族关系的和谐；
- 为移民的社会和文化适应、融合创造条件；
- 加强多民族的俄罗斯（俄罗斯民族）统一和精神的一致性；
- 保护和发展俄罗斯各民族的文化多样性；
- 为保护和发展俄罗斯各民族语言以及将俄语作为官方语言创造有利条件；

- 改善国家和地方政府与公民社会体系的互动关系；
- 发展国家民族政策领域的国际合作。

该战略规定，俄罗斯政府制定主要的评定标准（指标），以评估该国的民族关系状况，各联邦主体政府和地方自治机构在执行国家民族政策过程中的效果；监督该战略的执行情况，在结合各联邦主体报告的基础上向总统提交年度报告。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 1 期-第 318 期均可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图书分馆网页下载：
<http://www.sachina.edu.cn/library/journal.php?journal=1>.
也可登陆《中国民族宗教网》<http://www.mzb.com.cn/html/Home/category/36460-1.htm>
在“学术通讯”部分下载各期《通讯》。
《通讯》所刊载论文仅向读者提供各类学术信息，供大家参考，并不代表编辑人员的观点。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本期责任编辑： 马戎、王娟
邮编： 100871
电子邮件： marong@pku.edu.cn